

止 觀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文藝界五十年

洪天賜教授捐贈

文藝界五十年

觀止著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 目 次

## 题 记

|                      |    |
|----------------------|----|
| 一九六七年的马华文艺界 .....    | 1  |
| 一九六八年的马华文艺界 .....    | 12 |
| 一九六九年的马华文艺界 .....    | 30 |
| 一九七〇、七一年文艺新书编目 ..... | 45 |
| 一九七二年的马华文艺界 .....    | 49 |
| 一九七三年的马华文艺界 .....    | 60 |
| 一九七四年的马华文艺界 .....    | 72 |

## 附 編

|              |     |
|--------------|-----|
| 文化建设芻议 ..... | 87  |
| 编余杂谈 .....   | 97  |
| 读报随笔 .....   | 110 |

《浮生六记》巫译本出版

文化交流

《荷珠配》的演出

电影与电视

《大安》和《书报》

喜剧会串

本地作品音乐会

许绍南藏书

代序二则 ..... 120

读《轻风细雨集》

读《阳光普照》

旧诗六首 ..... 123

假日偶成

除夕书怀

张君元夜招饮席上即兴

读抗战史话奉和 Y 君

次 V 君韵

悼柯君

## 题 记

由於职务关系，自一九五六年起，陆续写了十多篇关于一年间文艺界动态的报导文字。开头的几篇，曾於六十年代初期编成一册《文艺界五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其后数年所作，也分别收入了《文艺杂论》及《文艺杂论二集》中。最后剩下下来的三几万字，便成了现在这一本的稿源。因为一共是五篇左右，取其成数，书名就叫做《文艺界又五年》。

一九七〇及七一两年，忙於其他琐事，没有动笔，只整理了一单新书编目而已。现在把它当作出版史料收了进来，方便大家需要时的查阅。

这类文章，今后大概不会再写了。因而本书的编印，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在这一方面办个小结束。

“附编”中的若干旧稿，有的是屬於酬酢性质或抒写个人牢骚的文字，有的更纯粹是业务上的应景之作，内容和我现在的看法尤多不同，本来大可不必拿来凑篇幅的；但又想到其中或者还有些少资料可供读友们参考也说不定，於是不揣谫陋，一并辑入了。

觀 止

一九七五年一月

## 一九六七年的马华文艺界

### 副刊、雜誌

马华文艺的萧条萎缩的情况，一年来依然未见有何改进。文艺园地的贫瘠，新书出版的减退，大抵还是老样子。理论批评方面有了一点波动，创作的成绩却是荒歉如前；戏剧界的组织活动有了某些加强，实际的演出却似乎更加疏落。

表面看来，本年的文艺报刊，确是多了好几种的，如先后创刊的《文风》（杂志），《青年园地》（南洋商报），《新社文艺》，马六甲华商报《文艺》版，经济时报星期刊文艺栏等是；旧有的刊物，也有好几个停顿了一个时期又再出现的，如星大中文学会的《文艺季风》，南洋商报檳城版的《绿原》（每周一二次）等。还有一两个向来专登港台作品的刊物，也宣布要走“马来西亚化的路”，彷彿马华文艺真的有点热闹起来了。

实际上，文艺园地还是一片荒凉，不见得有任何开展。因为，新的刊物名目虽然不少，容量却很有限，有些甚至祇

是昙花一现，无补大局。例如《文风》杂志，就只出得一期。寿命同样短促的还有一个《青春月刊》（一期）和檳城的《文新月刊》（二期？）。经济时报星期刊的文艺栏，每期不过四五千字，也祇出了三几个月，最近好像是收盘了。原有的一些刊物，则有的完全停刊，如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星洲日报的《艺文》；有的等於在办结束，一年出不到两期，如《海天》及怡保的《新潮》。在这种情形底下，若干新刊物的出现，也不过尽了新陈代谢的补替作用而已，并不是容量的增添或扩展。而且，这种代替性，也可以从报刊的内容看出。特别是一些同样提倡现代诗的刊物，其新陈代谢的情形尤为明显。

所以，到了本年年底，在当地较易看到的文艺或文艺性刊物，仍然是十多二十种，与过去三几年大抵相同：

三日刊——青年园地（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南洋商报，有时改为《文艺》），青园（新明日报）。

周刊——星期小说（星洲日报），星艺（星檳日报），南斗，青年文艺（光华日报），文戈（中国报），晨钟（通报），文艺（华商报），旗（阵线报），新生代（民报），文艺版（商报，十二月创刊）。

旬刊——文化天地（行动报）。

月刊——浪花，新诗月报，狮岛青年。

季刊或不定期刊——新社文艺，文艺季风，新野，新潮。

以上各个刊物，其中有三几种，如《新诗月报》，《文艺季风》等，可能也是已经停刊了的。

至於综合性刊物，情况也无甚改观，趣味化的色彩还是有加无已，许多副刊完全变成了西洋文摘的翻版，登载的无非是《中东怪俗》，《丹麦采风录》，《失魂鱼趣史》，《南美的扒手学校》一类的东西。本年虽有一两个新的杂志创刊（如《新加坡》），但也有些旧刊物宣告停版（如《狮子城》），因而经常容纳一点文学稿件的，也依然是寥寥几种，包括《星云》，《少年智识》《电视与广播》，《南洋教育》（月刊），燎原报（月刊），《新加坡》（月刊），《新青年月报》等。（另有一个《新青年》杂志，为社阵所出版，属非卖品。）此外就只有新加坡电台的《文学节目》，每周播放半小时。

### 新書出版

副刊杂志的情况固然没有什么起色，书籍出版业更是继续在走下坡。一般人所指出的华校学生人数锐减，华文阅读程度降低；或者会考频仍，功课加重，学生无暇接触课外读物；以至世纪末颓风的泛滥恣肆，黄色文化的毒害青年等等，固然都是一部份原因；但造成文艺书业不断衰落的现象，更重要的还是社会风气的愈来愈现实，文凭主义的愈来愈风行。许多青年对于取得一纸打字，速写，簿记，或修理无线电收音机的修业证书，比较对于艺术与思想的进修有兴趣得多了。此外，一两年来一些比较爱好健康文娱的青年团体的陆续减少或停止活动，以及联合邦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包括印刷品）的徵收二巴仙附加税（最近已宣布取消），也

多少影响到文艺书籍的流通与销行。因之今年来新书的出版，不但种类再呈减退，连印数也一再割少了。下列的二十种新书，据笔者所知，大部份的印数都是一千册左右：

诗集——无名河哼哀歌（山河），新星集（秦林），惜昨集（李汝琳），青春献歌（孟沙），旅心（柳北岸），梦土（柳北岸），路，赶路（北蓝羚），海上放歌（初声），小月曲（谢锦霖，未见），北望祖国的蓝天（戈萌）。

小说——火的道路（史雷），第三个希望（泡蒂），青春的糟蹋（采人），青春的脚步（郭四海），马华新文学选集（方修编）。

散文，评论——迎春小唱（以今），文艺杂论二集（观止），画像（曹莽），幸福门外（慧适），重亮的燭火（端木虹），泰国艺术丛谈（玛戈），我对文学的认识（林鲁等著，油印），内疚集（梁艳坤），论马华作家与作品（赵戎），美加遊记（郑皆得），文学与生活（苗秀），归燕集（梦虹）。

其他有关著译——教学杂谭（林琼），政论新集（李星可），新加坡史话第二集（曾铁忱），新加坡之路（李光耀），现代马来西亚中国小说（英文本，李星可编）。

上列各书，除了一两种性质比较特殊，能够销上一二万册之外，余者如《无名河哼哀歌》，《火的道路》，《迎春小唱》，《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卷一），《文艺杂论二集》……等，印数大概很少有超过三千册的。

由於书籍滞销，印数减少，导致成本提高，排印不大合

算，出版界乃出现了一种利用小型柯式印机，打字影印的方法。据说採用这种方法出书，印费廉宜，祇要有七八百本的销路就可收回成本。所以今年出版的二三十种新书中，就有五六种是用这方法印刷的。在这出版业萎缩不振的季节，这种印刷业务，预料可能还会有较好的发展。

## 評論、創作

如果说今年的文艺界还有某一部门呈现了一点波动的话，那就是理论与批评了。这方面，较受瞩目的有下述数事。

一，阵线报《旗》版的“文艺笔谈”。该版由去年底开始出现《文艺笔谈》的写作，检讨文艺界的一般现象。今年初起渐渐涉及一些具体的问题，并批评了《新诗月报》，《新野》，《新生代》等刊物的若干作者，指为《牛鬼蛇神》。稍后又摘要刊登了一篇集体执笔的长文——《当前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若干问题》，针对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创作方法，批评问题等等，提出较为广泛的意见。另一方面，被牵涉到的作者也有好些反击的文章发表，如《牛鬼蛇神篇》（杜红），《鬼物四詠》（钟祺），《没落》（于进），《拿出货色来》（以多）等。

二，《浪花》月刊（吉隆坡）的“批判运动”。该刊由第十六期（？）起宣佈革新内容，特别加强理论批评文字，称为“文艺大批判运动”（葵花）。初时的批评对象是唐林的诗作《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其后范围逐渐扩大，批评到

较多的作者与作品，指为“伪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有关文章的内容，一小部份略同於阵线报的《旗》版，一部份则是针对联邦方面的“现代派”。

三，關於战后马华诗歌发展问题的论争。先是柯戈在《蕉风》上写了《过去的烙印》及《评「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两篇长论，指摘钟祺在《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中自视与杜红，坚石并为一九五六年前后的“最受人注意”的“爱国诗歌”的作者，乃“编造史实”，“歪曲诗歌历史面貌”。接着，《蕉风》的另一作者英培安则撰文提出反批评，钟祺本人也在《新诗月报》上有了一点反响（《再见，ABC》）。大约同一时候，又有《经济时报星期刊》介入论争，一连三期发表了远铃的一篇《从遗漏中看马华诗歌的发展问题》，指责双方面都遗漏了好些重要的作者作品，其中有些史实是被有意掩盖的。但这篇文章却又引起了阵线报副刊的批评，认为對於若干作者（包括高宁，严思）的评价失之过高。

四，關於诗歌风格问题的论争。有关文章散见於《新生代》，《晨钟》，《新加坡》各刊物，作者很不少，但主要的还是钟祺，李霖，陈凡等三位。问题是钟祺批评李霖在《惜昨集再版后记》中所说的“所谓风格什么的，那是形式主义诗人特意追求的东西”一句话引起的，最近似乎集中到两个焦点上：（一）风格是否为一个中立词，可以有好的风格，也可以有坏的风格？（二）刻意追求风格，是否会掉进形式主义的泥坑？钟君的意见是否定的，李陈二人则予肯

定。

此外，新加坡电台《文学节目》所推出的书评，行动报《文化天地》等刊物对于港台的一些灰色电影灰色小说的批评，以及联合邦若干报刊的关于现代诗的论争的文章，数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一年来，创作方面，却就没有理论批评来得发达。这种创作落后于批评的现象，可以说是普遍的，全面的，不限于某一地区某一流派为然。一般说来，题材比较新鲜一点的还是一些时事诗，包括描写越战的故事，声援阿拉伯国家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反映欧美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等等，间也涉及约翰逊总统的访问东南亚，以至苏联今日的社会现象（如《西伯利亚的哭泣》——经济时报）。其次则是若干较深刻地描写下层社会生活的写实小说，如《杨亚六夫妇》（余若智），《孙怪虎走江湖》（张威）等，但以短篇为多。中篇较受注目的似乎只有宋雅的一篇《明朗的天》。保持着较高的情操是作者一贯的特色，取材上则没有太多新的开展。

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本年初因该刊编者杏影先生的逝世而宣告停刊，这也是影响到今年的创作界的荒歉的一个小小的因素。杏影先生主持下的《青年文艺》，继承以前《文风》副刊的传统，选录的稿子多数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斯人既逝，这一方面的贡献遂成绝响了。近数年来，不少的文艺作者，都先后作了古人，一时记起的就有苏文慕，王哥空，鲁白野，黄科梅，金石声，卓凡（？），丘絮絮，

曾铁忱，以今，杏影等多人；就中以以今及杏影两位最是令人悼惜。因为他们本来还能够为文艺界多做好些事情，而后的谢世所带来的损失，尤其显而易见。

## 戲劇活動

戏剧界的情况，今年的特点则是在於组织活动和培养后进。这方面，也有好几件事可以一述。

一，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成立。新加坡文化部於一月卅日召开各文化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以推动文化艺术活动。三月廿八日，举行会员大会，选出第一届执委（主席为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七月卅一日，宣佈筹建国家艺术学院暨美术馆，并发动募款，预定目标为三百万元。迄十二月底止，由各界捐助，义演，义展所得，已达七十余万元。此外，该会也於最近推动作家协会的组织，并準備於明年正月至二月间与国家剧场信托基金会联合举办盛大博览会。国家剧场方面也於十一月间成立“国家剧场俱乐部”，利用剧场的小型午台，每晚提供例常的文娱表演。

二，各戏剧团体普遍培养新血。新加坡艺术剧场，表演艺术学院，新加坡电台儿童剧社等团体，本年间都发动招收新学员，设立研究班或训练班，分别训练他们的接班人。其中艺术剧场所设的研究班，包括“戏剧讲座”，“小说欣赏”，“读词训练”，“呼吸训练”，“排演实习”等五种，努力的范围最为广泛。又，丽的呼声也有“儿童话剧组”的

成立，同样是一种培养新人的工作。

三，电台电视台较积极地罗致话剧界的人才。新加坡电视台本年拍摄了好几个华语话剧与文娱节目，包括“借雨伞”（电台儿童剧社），“把国旗挂起来”（王里），“碧血花”（南大十周年庆典演出），“七十二房客”（艺术剧场）等。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则举办了一次广播剧创作比赛，选出七篇作品：洪氾（叶苔痕），光明的希望（陶熠），来自荷花港的人（王钦明），胶林风雨（圣燕），被熄灭的火（高秀），长沟（周伦），花一般的梦（零雁）。各剧已在排录中，即将陆续播出。

然而，午台上实际演出的成绩，本年却仍然没有什么进步。已知的较大规模的戏剧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献演，同样只有下列十场左右而已。

戏剧方面：

黑魂（美国剧本，三幕，郭宝崑译）——新加坡艺术表演学院。（三月十六——十九日）

娜拉（易卜生）——新加坡艺术剧场。（三月廿三——廿六日）

戏剧晚会（捉鬼记，人类何价，县官坐堂）——人民行动党红山支部。（四月七——八日）

归来（四幕）——人民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五月四——五日）

朱门怨（四幕）——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七月六——九日）

全家福（四幕）——芙蓉振中戏剧音乐研究会。（七月廿七——廿八日）

戏剧公演（林晨：“一个有钱的人家”，宋人：“蒙将军”，朱雷：“县官坐堂”，朱绪：“华尼迦”）——人民行动党中央文化局戏剧股。（九月六——七日）

七十二房客（四幕）——新加坡艺术剧场。（九月十四——十七日）

金小玉（四幕）——联艺剧团。（十月十一——十五日）

剪辫记（三幕，沈中鸣著）——行动党三巴旺支部。（十二月九——十日）

高加索的母亲（德·布莱希特原著）——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十二月廿七——廿八日）

表演艺术方面（与华语较有关系者）：

一月——新加坡人民协会主办“文娱晚会”（节目包括刘仁心作诗歌造型“新加坡颂”）。

五月——星市音乐会“团员独唱会”；佳音合唱团“独唱会”。

七月——佳音合唱团“演唱会”；新加坡青年节“音乐午蹈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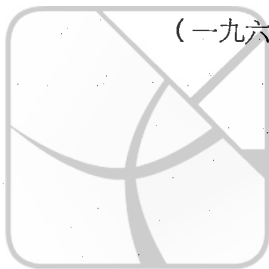
八月——新加坡设计表演社主办巡迴马来西亚“音乐午蹈歌唱晚会”（由表演艺术学院与星市音乐会联合演出）；“新加坡之夜文娱晚会”（节目包括“红头巾女工午”）。

九月——佳音合唱团“音乐晚会”；吉隆坡学生周报学友会“文娱遊艺晚会”（包括话剧“人猫之间”）。

十一月——联合邦八音乐团体联合主办“歌乐节”。

从上表可以见出，一些较有历史的戏剧团体或音乐团体，如康乐音乐研究会，华中校友会，中正民乐研究会（？）等，演出已经愈来愈少。记得去年还有过三两场，如“生活的旋律”，“阿Q正传”等，今年却就完全没有声息。戏剧工作的条件，说起来真有点像是王小二过年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 一九六八年的马华文艺界

### 重心刊物的消失

这是马华文艺晋入高度低潮时期的第六个年头，一般情况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文艺报刊方面再也找不到一个中坚园地，专书出版业也失去了它的重镇所在；理论批评部门去年还有一点波动，今年却比文艺创作更少建树；戏剧与表演艺术方面，又似乎不如绘画作品的更受欣赏。

文艺副刊与杂志，本来是马华文坛的主柱，各个时期的文艺报刊，也都有一部份较有代表性者为其重心，居於主导地位。譬如战前的抗日卫马时期，一般写作活动是以星洲五大报的副刊为中心园地；一九五三年至五六年间的反黄运动时期，则以《文风》副刊及《人间》，《生活文丛》等杂志为主导刊物；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星洲日报《文艺》版，《文学，生活》、《理论与创作》等集刊，以及《大学青年》等杂志，都曾先后充当一段时候的要角。到了一九六三年初以后，副刊，杂志，集刊等都全面衰落，文坛失了基柱，马华文艺的发展遂进入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况，有许

多作品不是发表在普通的副刊，杂志，或集刊上面，而是散见於一些团体的会讯，毕业校刊，戏剧演出特刊，或一些打字影印的杂志式的小型报章上面。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比较正规的出版物中，也还不时存在着一两个较有生气的副刊或杂志；虽然气势不壮，而且频频夭折，脉络不大连贯，却也曲曲折折，欲断还续地把马华文艺发展的统绪维持了下来。这些报刊包括已故杏影先生编辑的《青年文艺》副刊，新加坡的《现代文艺》及《南风》杂志，吉隆坡的《半山月刊》及《浪花月刊》……等等。然而，今年起来，这种具有主体地位的刊物，却是一个也没有了。《浪花》停刊了，一两个稍有一点现实性的副刊如凤凰报的《原野》，星洲日报的《星期小说》等也维持不下去。於是许多写作者似乎完全成了散兵游勇，作品的发表呈现了无所适从的状态。有的直接出成专书，如宋雅的《永别了忧郁》，司马心的《最后的藤叶》；有的凑成了一册集刊，却又无以为继，如林鲁等的《阳光照满了心怀》；也有不少的稿件流到一些综合性的刊物或香港杂志去，如星洲日报《生活》版的部份杂文；《文艺世纪》的《青年文艺之页》的《笑的破灭》等小说。本地的若干文艺副刊以及电台的文学节目，偶尔也会出现一两篇较为可观的作品，诸如南洋商报《文艺》版的里巷的散文等；不过数量微乎其微，杂在大量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低级趣味的作品之中，顷刻就被淹没了。

低级趣味的作品的泛滥，情形尤为特别。其他各种文字，不论是莫名其妙的所谓“现代诗”也好，自然主义的小

说也好，或者是宣扬什么人性自由的高深玄妙的论文也好，大都还是循规蹈矩地的一些副刊版上亮相。而一些灰里透黄，无聊当有趣的东西，却获得加外的宠爱，大摇大摆地跨到副刊界外来开疆拓土；譬如本坡新闻版来一套“占士邦大战火星”的连环图画，国际新闻版来一批什么“艳福齐天”，“老板娘之恋”的精彩传奇，南洋新闻版又来几幅什么“电髮院风情”，“飞车与阉鸡”的插图精选。好在中西报章的新闻版，一向都是乌烟瘴气的，多添上一些脏东西，大家也会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至於原来的一些已经十足趣味化了的综合性副刊，自然是更加“多姿多采”了。除了固有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以及什么“古今胸围尺寸”“中西玉腿大观”等奇文之外，连大汉奸周作人的早已被人唾弃的黑文章，也搜出来当作什么特稿，登个不完。这也算是一个新奇的现象。

以上是有关本年文艺报刊的一些特点。下列则为个人所见的副刊杂志一览：

三日刊——青年园地（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南洋商报）。

周刊——星期小说（星洲日报。年中停刊），星艺（星报），旗（阵线报），青年文艺（光华日报），文艺（南洋商报），青园（新明日报），新生代（民报。另出有合订本二种），晨钟（通报。下半年停刊）。

旬刊——青年笔阵（行动报）。

双周刊——戏剧春秋（商报。本年初创刊）。

集刊，季刊，不定期刊——阳光照满了心怀（创造文化社），新社文艺（三期），文艺季风（星大中文学会，一期），新野（二期），绿原（南洋商报北马版）。

部份内容有关文艺者——文戈（中国报），星云（星洲日报），生活（同上），少年智识（同上），遊艺场（同上），新加坡月刊（行动党中央文化局），电视与广播（双周刊），南洋教育（月刊），新潮（不定期），新青年（不定期），星岛少年（不定期），狮岛青年（不定期），政协报（月刊），论坛（南大学生联谊会，不定期），史地季风（年杪创刊），智识报（周刊），人民论坛（新加坡人民党机关报。半月刊），娱乐圈内（南洋商报）。

### 出版業潰不成軍

与文艺报刊方面的缺乏中坚刊物的情况相同，一些文艺书籍的出版社，亦都节节败退，潰不成军。本地文艺专书出版的蔚为风气，本来开始於二次大战结束后。从这时候起直至六十年代初期，每一阶段至少总有一两个出版社，在这一方面居於主体地位。最初是一些戏剧工作者集资编印丛书，出有杜边的《明天的太阳》等剧本。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书刊入口锐减以后，又有一两家报社利用附属印刷部的剩除物力，出版文集，印有杨守默的《读书与写作》等作品。接下来则有生活文丛出版社等，印行了马亚的《生活的水流》，任宁的《在路上》等散文。五十年代后期，青年书局崛起，出有韩素音的《餐风饮露》等小说。六十年代初期，复有文

艺出版社，草原文化社，长空文化社，青山文化社……等相继成立，分别编行了《小茅屋》（贺巾），《呵，我是青年了》（宋雅），《真正的爱人》（苏莉），《避席集》（方修），《椰林夜歌》（宋李桑），《青青草》（高静朗），《青春的哭泣》（原甸），《文学与人民》（忠扬），《生活与文学》（宋丹），《为人民而歌唱》（史扬），《热爱土地的人》（流军），《水塔放歌》（槐华）……等一系列单行本。此外，世界，上海，人民各书局，也曾一度成为文艺书业的重镇，以今的《椰林短曲》，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吴岸的《盾上的诗篇》，马阳的《祖父的故事》，宋雅的《绿色的藤叶》，韩玉珍的《茉莉公主》……等书，就是这些机构分别出版的。近三几年来，各大书局对这方面的事业已无甚兴趣，但若干小型的出版社却仍不绝如缕地出现，诸如天桥文化社，明天出版社，浪花出版社等，先后也印行了《在生活的道路上》（李贩鱼），《风雷集》（严思），《青春的生命》（伏浪），《向冼星海学习》（尚聂），《火的道路》（史雷）等理论及创作多种。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就只剩下一个长风文化公司，虽然还出有山河的《无名河，哼哀歌》以及李过的《真正的爱情》等一两个集子，然已成了强弩之末，后劲不继，过后就陷於停顿状态了。今年下半年，世界书局印了一册《马华新文学选集（戏剧卷）》，上海书局推出了一册《扬尘集》，也只是客串性质，不再是重心所在。倒是刊登在《最后的藤叶》书后的香港《马来亚新文学出版社》的《马来亚新文学丛书》的书目预告，

反而显得阵容壮盛，大有起而执马华文艺书业牛耳之势。

根据预告，这套丛书的内容，仅仅第一辑就包括了三本理论：马华新文学的概念与特征（罗敏森），战后前十年的马来亚华族新文学（李山），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马希克），三部诗歌：孕妇岛的传说（原甸），苦椰（周慧予），重弹集（司马心）；两部小说：椰花泪（谷岩），以及两部多幕剧：挣扎（司马心），金山风暴（蒋荃）。如果这套作品能够顺利出成，那倒是现阶段文艺出版界的最大盛事。

但截至今年年底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新书还祇是下列的一些，未有这一辑丛书在内：

小说——永别了忧郁（宋雅），真正的爱情（李过），杀那的正午（方北方），升旗山下（征雁），割爱（韦西），情感的刽子手（李旺开）。

戏剧——“马华新文学选集（戏剧卷）”（方修编），最后的藤叶（奥亨利原著，司马心改编），悬崖（王里）。

散文——扬尘集（丁彦），三余集（陈世能），永恒的记忆（林琼），风雨飘摇的路（温任平），消夜集（再版本，李汝琳）。

诗歌——母亲的泪（唐林），昙花（蔡欣），待日（苗芒），千年之莲（周粲），英雄讚（钟祺），并蒂莲（林琼），钟瑜诗集（钟瑜），曙光（黄汉雄），塑像（秦秦），巨人（牧羚奴），天朗（贺兰宁）。

理论或其他有关著述——先秦思想家简介（章翰），中

国古代诗歌真伪问题初探（林徐典），政治实践的若干理论观察（李廷辉），马华文学史话（苗秀），甘地传（连士升），亚洲教育史（黄德衡）。

翻译——长城内外（麦海译），小侦探爱弥儿（亦文译）。

### 文藝創作與評論

在创作活动方面，以政治时事为题材的诗歌和杂文，一年来仍相当盛行。特别是诗歌创作，由於时局动盪加剧，尤增添了不少新鲜的内容，诸如支持墨西哥，乌拉奎，与欧洲各国的工运学运以及美国各地黑人民权运动，谴责美国种族主义者的谋杀路德金以及苏联的侵略捷克等等。不过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阵线报的《旗》版上，集刊《阳光照满了心怀》和凤凰报的副刊《原野》上也有一小部份。至於其他刊物，则以小说创作及议论散文较为丰富。《星期小说》版曾先后容纳了不少的小说佳作，如吴羊的《黑线上》，曾苍的《舢舨夫》，方向光的《我还有一辈子的时光》等，就都是相当结实的作品。议论散文则出现在《生活》版上比较多些，大概每期都有一两篇短小精悍之作，谈论人生百态，很富於启发性，这里摘录几段文字为例——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少数人笑大多数人哭，那么世界就不公平。如果大多数人笑，而只有少数人哭，那就好了。”（黄彬：《笑的种种》）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对吗？我看只对了一半。如果说，

吃的问题是民生的主要问题，这是对的。如果说人民只知道吃，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求，那就太鄙视人民了。……管子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这句话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它会使人为了己的‘衣食足’而忘了‘荣辱’，去幹伤天害理的勾当。”（何最：《谈吃》）

“儿童……往往不如一般人所想像，所讚美的那么纯洁。有说谎的儿童，有偷父母的钱去吃去赌的儿童，有开口闭口都是粗话的儿童，还有以为自己的父母亲都是大老板而自高自大的儿童，有瞧不起穷人的儿童，有年纪小小就想入非非的儿童。……这当然不能怪儿童，只能怪那些沾污儿童心灵的人和事。不良的电影书报，还有越来越盛行的赌风，不良的家庭影响和不健全的学校教育，都是导致儿童学坏变坏的因素。如果闭眼不看这些事实，而高嚷什么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和栋梁，那不是很滑稽的吗？”（岳文：《年纪篇》）

南洋大学中文学会今年举办的“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笔者曾读过大专部份的小说作品。从这些作品的内容看来，这一次似乎不及以往各届的类似比赛那么气象壮阔。这和南大本身的发展情况倒是相适应的。然而也还有一两篇创作，写得颇为出色，可以算是今年创作方面的一宗小收穫。最可喜的是那篇《小黑》，纪录一般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与互助精神，题材处理正确，文字细緻生动，有好几个场面十分感人，不比以前任何一次创作比赛的得奖作品逊色。其次是《浪》，描写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毕业后在人生道路

上的迅速分化，也是近年来本地社会较有典型意义的题材。此外还有一篇《明天是另一天》，在反映渔村的贫困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可惜主题思想方面掌握得不大好。

理论批评部门，一年来可说是风平浪静，没有多大的波动；也没有较重要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一些报刊上虽也发生过若干有关文艺问题的争执，但都属於微枝末节，引不起较广泛的注意。唯一比较受人瞩目的，要算是二月间行动报发表的一篇长文：《论李汝琳的抄袭技巧》。该文作者陈其丑，引录了十多段文字，论证李氏的《消夜集》中的《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收穫》一文，是由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抄袭来的。

接着，李汝琳在《新生代》写了一篇《声明在先，无可非议》的答辩文章，说陈其丑即陈群，企图“骂人求名求利”；说《消夜集》的《后记》里已经有说这本书是“编编写写一类的东西”，也就是声明了那不是自己的著作；又指出《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收穫》一文，虽然“有近似王瑶的文字”，那决不是“全盘抄袭”。

之后，通报的《晨钟》版及《新社文艺》等刊物，各出现了若干短文，直接间接谈论这事件。其中有一篇陈群的《评李汝琳的消夜集》，曾以有关艾芜的《故乡》及老舍的《四世同堂》两段文字为例，诬指李氏的文章除了个别字眼之外，“完完全全”是抄袭王瑶的著作的。

前三两年，有些刊物分别指责贺光中的《光中词选》的序文抄袭缪钺的《诗词散论》以及孟瑶的《中国戏曲史》抄

袭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都曾引录了好些原文为证。因而这一次也就有人把有关“消夜集”的问题与上述二事相提并论。其实，各人的情况可不一定相同。据笔者所已知道的，贺光中文章的确是由缪钺的作品搬过来；（贺氏本人对此也不否认，但解释称：那是他在港大教书时编为内部参考资料，别人把它拿去出版的。）孟瑶的《中国戏曲史》则是东抄西袭，拚凑成书，并非纯粹来自周贻白的著作，很多同类的书籍，如冯沅君的《古剧说彙》等，都是她剽窃搬抄的对象，愈深究下去就愈暴露她的底细。她对于“抄袭与改写”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的指摘表示不大服气，但又不敢坚持说她没有抄袭，且终于不得不辞去南大的教席者，原因就在这里。至于《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收穫》一文，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似乎不应遽下结论，要待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公开出售，细加查对之后，才能下一判断。（据说该书已在翻版中）

### 戲劇工作的分化

戏剧艺术的活动，各团体之间从去年起已渐渐在路向上有了分化。一部份剧团倾向于较能自由选择节目的室内表演，少在维多利亚剧院等场所作公开售票的演出。例如社阵的文娱组织，前年还有“抗美援朝”之类的公开表演，去年开始就再也未有这类活动；今年似乎也继续着这个方向。如“迎接春节文艺大会串”（二月？）“六一三文艺晚会”等，就是假该党淡申律支部举行。“康乐音乐会”等也有类似的

情况，所以今年仍然不易在大演剧场中欣赏到他们的演技。加上一些校友会的戏剧股的停止活动，更使到经常在作公开演出的剧团又减少了一些。现时比较活跃的，大概就祇剩下艺术剧场，新加坡表演学院，联艺剧社，新加坡广播电台的儿童剧社，国家剧场戏剧俱乐部（本年成立），吉隆坡剧艺研究社……等七八个单位而已。因而一年来的戏剧公演，也大多是这些团体所提供的：

七十二房客——艺术剧场，一月十日（重演）。

高加索的母亲——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一月十六日（重演）。

维他小姐（四幕）——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三月初旬。

朱门怨（六场）——艺术剧场，三月廿一至廿四日。

悬崖（四幕）——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九周年纪念，三月底。

錶（四幕）——新加坡电台华文部儿童话剧组，四月十四至十九日。

黑与白（哑剧），八根火柴（短剧），胶林颂（诗歌造型），两姐妹（朗诵剧）——表演艺术学院，五月五日。

独幕剧大会串（叶苔痕：《乔迁之喜》；田流：《午餐时刻》；王里：《夜课》）——新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华语戏剧组，五月廿二，廿三日。

憩园（姚拓改编）——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七月十日至十三日。

契诃夫纪念晚会（《蠢货》，《未来的婚姻》）——表

演艺术学院，七月廿日。

独幕剧《生日》及《临时抱佛脚》——圣若瑟华文黄昏中学戏剧研究会，七月十三日。

憩园——霹雳华工服务社，七月中旬。

独幕剧公演（汪仲贤：《好儿子》，欧阳予倩：《回家以后》，林晨改编：《香格里拉小姐》）——新加坡艺术剧场，九月五日至八日。

乡村骑士（意大利独幕歌剧改编）——星市音乐会，十月廿五至廿八日。

陞官图（陈白尘）——艺术剧场，十月卅一至十一月四日。

喂，醒醒（十场，集体创作）——表演艺术学院，十二月廿七至廿九日。

表演艺术方面，也与戏剧情形相仿，公开售票演出的团体同样少了一些。一年来表现得最积极的当推佳音合唱团，一共举行了六七次音乐晚会，包括二月十六至十七日为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及圣希达女子中学筹款，五月十八至十九日赴麻坡芙蓉等地义唱，以及十月五日的筹募国防基金等。其他各团体的较盛大的演出则是：行动党中央文化局的“音乐晚会”（一月十二至十三日），联艺剧团与海韵合唱团假繁华世界博览会联合举行的“遊艺晚会”（二月十八日），抒艺音乐会的“音乐晚会”（四月卅日至五月一日），李豪合唱团的为艺术理事会义演（五月十二日），国家剧场艺术团的“音乐歌唱演奏大会”（八月十八至十九日），人民协会文

娛团的“成立演出”(十一月)，以及南洋商报合唱团的巡迴演唱等。

### 繪畫藝術的進展

在马华文学艺术史上，一向稍为落后於语言艺术及戏剧艺术的绘画，今年倒是脱颖而出，似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主要是表现在赤道艺术研究会的十二周年纪念画展上。

赤道艺术研究会成立於一九五六年，设有音乐，美术，舞蹈各股，积极提倡健康文娱，培养青年艺术工作者。其中以美术股的贡献最大，十二年来，为当地造就了众多的绘画人才。目前星马的知名青年画家，有不少就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但该会一向似乎比较侧重於艺术形式的钻研，忽略了绘画内容与作者思想的充实，所以工作成绩还不十分理想。譬如许多出身於该会的画家，一旦艺成名就之后，即与该会成了陌路，就是一个较易见的例子。最近一两年来，该会显然是在努力改革画风，矫正偏差。这次的十二周年纪念画展，就是他们的新成绩的初步展示。

这个画展於本年十月廿五至廿七日假中华商会及该会会所分别举行后，即获得广泛的好评；星洲日报的新闻版也有特写稿《艺园里的花盛开了》加以介绍。该报记者龙哥在文中发表他的观后感说：

“本邦的美术界，向来是一片热闹的。在这并不很大的艺术园地里，茁长着这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名花和毒草，五彩缤纷，令人眼花撩乱。……在这不寻常的情形下，鲜明的

现实主义艺术大旗，在纷乱之中，以鲜明的色彩与形象，反映出真的和假的，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原形。在园地里遊倦了的人们，自然能够把鲜花和毒草加以分别了。……

“本届画展的特色，将表现在十多幅创作油画，如郑文彬的‘央记水兵’，‘卖冰淇淋的小孩’；许锡勇的‘菜农’，‘来了’；强盛的‘三万’；关义林的‘劫后’；张平生的‘失业’；陈振顺的‘破坏市容’；许四顺的‘卖报’；黄江河的‘散工’；沈钟发的‘报童’；谢振胜的‘失业的日子’；以及陆宇坚的‘讲故事’等。这些作品，取材范围极广，有小贩，农夫，酒吧，街童，学生等方面。作者通过色彩和线条，反映了生活，也充份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批判，不但能给予欣赏者以美感，同时也使他们认识生活，创造生活。”

赤艺负责人也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次画展的特点称：该会在过去举行的画展里，展出作品，内容仅限于静物，风景画，人像素描等方面，取材不广，内容贫乏，许多关心该会的人士，颇多提供宝贵意见，希望他们多多创作能够反映多姿多采的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意见，给予他们启示与鼓励，以便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这便是他们放手大胆创作以大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开始。（十月廿六日星洲日报“星加坡新闻二”）。

这一段自述是符合事实的。“赤道”成立之初，虽然也有过若干佳作，如《马来亚史诗》，《上国语课》等，为文艺界人士所津津乐道，但数量毕竟不多，与同一个时候的文

学作品所达到的成就比较起来，也仍有一段小距离。该会的产品的真正丰收，还应该以今年为第一次。

## 餘 話

本文执笔的时候，接到联合邦一位读友的信，抄给我某刊物的两段漫骂文字，希望我给予一点批评。为了回答这位读友的盛意，这里就顺便写几句吧。

应该说，那位骂人的先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祇见到我的文章没有提及他的大名与书刊便大发醋劲。如果他知道了实际的情况，那他就连呕酸也呕不出，反而要大感悲哀了。他说他每年都有专集出版，却不晓得我十几年来经常在购买书的新加坡的十几家大小书店，包括中华，商务，世界，上海，青年，学生，人民，胜利，学习……等等，竟然没有一家曾经卖过他的大著。因而我也从未见过他的每年都有出版的专集，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儿。

本来，写这一类资料性的文字，并不一定要做到绝无遗漏。事实上，由於篇幅关系，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没有遗漏。问题是究竟漏了些什么？是主要的本质的东西，还是次要的琐碎的事项？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作者与作品，还是报销主义文学，捞家小说，黄色书刊？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写唐诗概论没有漏掉李白杜甫，写英国戏剧史没有漏掉莎士比亚与萧伯纳，也就可以无大过了。这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为了省却大家翻检的麻烦，并藉以反映一时一地的出版界的现象，對於新书书目一项，我还是好坏兼收，尽量求其齐全，

无意漏掉谁的作品。那位先生以为我是故意不提他的大名，那是不免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些。现阶段的马华文坛，怪现象太多了，决不会因为多出现了他一个人名而坏到那里去。如果他的每年都有出版的专集让我见到了，也一定同样给留下一个书目的。然而文艺书籍滞销，书店档位宝贵，卖书有了选择，他的大作偏偏付之缺如，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未曾见到，或未能确定是否经已出版的书籍，纵使是最高明的目录学家也将无能为力。不论你自吹自擂，说你的专集比别人畅销了十倍百倍，还是恫言要参加什么国会议员竞选，也仍然是徒劳的。其实，好些文艺掳家，早已胜过国会议员多多，不竞选也罢了。至于抬出一个菲律宾作家来充“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更加没有用处。从英美作家以至苏联印度作家，我们都已见过一大把，觉得也都不过如是，何况是自邻以下的菲律宾文艺掳客？

据说，不懂得那位先生每年都出版了些什么专集，就等於没有资格写文章，而发表我的文章的人也变成了糊涂。这倒更像是在搬演“哭秦庭”了。因为那个报销主义文学的策源地，前年出版了一巨册文艺年鉴，竟然不去转载这位先生的精彩的《椰雨日记》，反而把我在本报发表过的《一九六五年的文艺界》一稿剪去改头换面，当作专章，还无中生有地写序文说什么感谢我的“赐助”，真无异是对於那位先生及其“资格”重重地掴了一巴掌。世间还有比这个更加糊涂的事么？也难怪他要显得那么痛心疾首了。

至于那个所谓出版了十二年的杂志，同样由於书店少卖

的缘故，我也是到了去年才连续见到三几期的，记得当时（大概是四五月间）它正在自称要改走“马来西亚化的路”。这么一个连它本身的方向也正开始在摸索的刊物，却要我一见之下，就能立刻确定是个本地的杂志，予以介绍，甚至追认，那也未免太过心急了些。不过我还是略仿单篇别录的办法，提及它的一两篇有关当地诗歌问题的论文。不料因此反而引起那位先生大发脾气，这倒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我想，既然这一类老爷们的脾气这么难以理解，以后还是一概敬谢不敏，连一个篇目也不提，省点麻烦为佳。反正他有的是大批廉价的纸张，大可自己写其椰雨文学史，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人会去理睬的。

这一段文字，大概又要使到《浪花》月刊的一位青年文友璞玉先生觉得“贻笑大方”了。因为看起来又好像是“自己与异己的笔墨官司”，不是“一年一度的马华文艺大事”。究竟这些是否仅仅是“自己与异己的笔墨官司”呢？各人的看法可能由於经历不同，对文艺工作的体会不同而不太一致；看过了别人的连篇累牍，彙集起来足可印成一厚册“围攻集”的恶毒的文章的人，观感可能又与只见到我的单方面的一点答复文字的人有所差异。我个人倒是没有必要多谈的。祇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我以为，纵使仅是“自己与异己的笔墨官司”，似乎也有多种多样的。有较偏於“私”的，也有较近於“公”的；（正如鲁迅先生在谈论所谓“私骂”时所说的：“在私之中，有的较近於公；在骂之中，有的较

合於理”。)还有毫无本质意义,可提可不提的;有能够显出一年间文学现象的特点,可以而且应该附入一年的“文艺大事内”的。譬如《浪花》月刊本身,今年是停刊了,但它的“异己”者对于它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假定它在明年复刊,再写一篇《一年来的马华文坛》,对于“异己”者的一连串的攻击,顺便择要答复,即使佔了“一年一度的马华文艺大事”的一半篇幅,我还是认为十分的自然与合理,并以最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文字,丝毫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假公济私,或“貽笑大方”的地方。因为对于那些攻击的答复,是完全有着本质意义的。它反映了在这一个马华文学的高度低潮期中,文坛上的妖氛邪气是怎样的疯狂猖獗,以及一般还不甘於“逆来顺受,唾面自乾”的文艺工作者是怎样的在走着艰苦曲折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 一九六九年的马华文艺界

### 雜誌、書報

一九六九年的马华文艺活动仍然是数年来的高度低潮状态的继续，没有任何特别振奋人心的场面。这里可以报导的只有下列几个小特点：一，杂志创刊的略为增加；二，文艺批评及文艺史料的受到较普遍的重视；三，本地剧作的上演佔了较大的比重。

今年创刊的纯文艺或文艺性杂志，先后不下十种。除了型式及刊期比较固定的《建设月刊》，《文艺生活》（高峰出版社），《展望》，《茶座》，《蕉风》（由现代派接办），《狮岛青年》（由小型报改为杂志）等外，还有集刊或不定期刊《加薪》，《谷又跌价了》，《时与潮》（油印），《猎户》，以及各中学学会出版的专刊如《湖声》（中正），文风（立化），《德新园地》（德新中学）……等。加上原有的继续出版的《新社文艺》，《新加坡月刊》，《文艺季风》，《新潮》（怡保），《电视与广播》……等几种，品种方面倒是颇有可观的。

各种新创刊的杂志中，内容比较坚实的是《建设月刊》和《文艺生活》。这是新加坡方面自从《现代文艺》和《南风》等杂志停刊以来首次出现的较有朝气的一批期刊。《现代文艺》及《南风》於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先后停刊，其后销途较广的便是吉隆坡出版的《浪花》。於是文艺杂志出版的重心，一时似乎有由新加坡移向吉隆坡的趋势（这期间在新加坡出版的同类刊物只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文风》）。到了前年年底，《浪花》停办，这方面的出版业就一直呈现着真空状态，延至今年初，始由《建设月刊》及《文艺生活》补替上来。

除了杂志之外，报章副刊及新书出版的情况都没有多大的变动。各报章推出的副刊，大多是原有的一些，诸如星洲日报的《星云》，《青年园地》，南洋商报的《文艺》，《青年园地》，《戏剧春秋》，民报的《新生代》，行动报的《青年笔阵》，新明日报的《青园》，阵线报的《旗》，中国报的《文戈》（近改为《晓风》），通报的《通道》（代替《晨钟》），星报的《星艺》，《莲花河》，光华日报的《青年文艺》，《南斗》（近来似由《星期茶座》取代？）……等。新出现的副刊只有《绿野》（南洋商报中南马版），《骆驼》（民报），《新风》（新明日报）等三几个（新加坡电台节目增加了一个《文化动态》）。人民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最近扩充篇幅，增辟文艺副刊《星火》，南洋商报也加添了《美术》《音乐》两个周刊，但已时届年终岁暮，有何表现，都要待看明年了。

书籍出版业也仍旧是去年的老样子：遊骑无归，失去重镇所在。虽然曾有几个新的出版机构先后出现，但都起不了主导的作用。反之，出版物的实质却有每况愈下之势。粗略算来，一年来断断续续印出的单行本，该有四十种上下，包括：

总集——弗特创作集（弗特），万年青（心秀），燕归来（陈云），新加坡我的母亲（张家华编）；

诗集——星之岛（苗芒），山（蓝平昌），向日葵（莎克），马路之歌（杜诚），第一声（孟仲季），手术台上（英培安），小阳春（秦林），火的得意（泡蒂）；

小说——第一个（罗林），无花果（詹芜），青山泪（冰迅），忧郁的眼睛（丁之屏），再见蕙兰的时候（孟毅），冲出云围的月亮（云里风），希望（张逸萍），古城春晓（黄叔麟），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卷二（方修编），晨光照耀着山村（巍萌），死亡与控诉（梁影），牧羚奴小说集（牧羚奴）；

剧本——归来（王里），喂，醒醒（郭宝崑执笔），黎明之前（钟祺），关新艺独幕剧集（关新艺）；

散文——文艺雕虫集（陈凡），旅英行脚（罗思），人生百态（岳文），闲情小品（巫汉明），新加坡河畔（林之夜），青鸟集（郑子瑜），读诗写诗谈诗（周燦），政论近集（李星可），你后悔此生是不（易梵），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黄德衡），欧洲名胜艺术巡礼（玛戈），新闻特写（尹鸿飞），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表演艺术学院剧团研究

部)，昨夜的雨（郑昭荣）；

再加上一些特辑如《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特刊》，《新生代合订本》（第三辑），《新马文艺创作索引》（谢克编）……等，倒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至於内容方面，则连电台的评论员也表示不满人意，认为“今年来所出版的各类文艺创作集，比起去年同时期的作品无多大进步”。（见新加坡电台广播稿：《今年来的新加坡华文文艺书籍》。文中提到二十多种新书，只有《人生百态》等三数种较获好评）

电台的评述虽然祇限於本年八月以前以及新加坡一地的出版物，其实也不难想见，八月以后是不会有什麼重要的进展的；联合邦各地由於“五一三”骚乱事件的影响，书籍出版业的一蹶不振，更是不消说了。

### 理論、批評

因此，今年如想多读一点本地作品，主要还靠广泛地浏览一般副刊杂志。一年来散见於一般报刊的文字，理论批评方面有较显著的增加。其中数量较丰的有两类。一是对於文学现象的批评以及文艺路向的探讨。这类文字以阵线报的《旗》版容纳较多。该版本年初有《一九六八年文艺工作总结》的万余字长文一篇，接着发表了一系列的短论，评论当地的创作，出版，以至音乐影剧各部门的种种现象。

新创刊的《文艺生活》也颇重视理论批评工作。该刊的长篇《发刊词》就是一篇相当全面的文艺批评，内容检讨了

当前的一般文学活动，并阐释了关于“文艺主流”，“健康文艺”，“现实主义”等诸多问题。文中认为当前的文艺主流是大众文艺；凡是真心诚意地为大众服务，“帮助他们掌握好思想工具，供予正反两面的教材，提高他们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反对倒退，促成进步，培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情歌颂他们的事业”，则“无论暂时的力量是大是小，有没有名流学者撑腰，定必是文艺的主流”；这同时也是文艺的健康或不健康的判断标准。该文也指出：“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在于文艺作者的主观意识非常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用具体的集中的生活和人物的典型来描绘这个本质。凡不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或者把局部的现象，把个人的主观小经验，当成是社会的整体的现实，当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成是本质的反映，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此外如该刊第二期的《在鲁迅杀出的血路上奋勇前进》以及《建设月刊》第七期的《发扬传统，促进文艺》，也都是很有份量的理论批评文字。前者提出“全面落实鲁迅精神”的纪念方式，后者论及文艺与时代的种种关系。以下是专论时代精神的一段——

“时代精神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具有的。所谓时代精神，概括来说，不外是特定历史过程中，先进人群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体现着那特定历史过程的时代本质。时代本质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立场出发，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而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把自己的命运跟时代联结起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

生活中，先进人群，劳动民众，从来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积极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实践，为改造环境而艰苦奋斗的性质和规模，总是决定了时代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因而必然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充份体现者。”

另一类较为常见的理论批评文字是一些新书介绍或作品论析。这是一般报刊的热门稿件。据电台的《今年来的新加坡华文文艺书籍》一文统计，今年出版的许多新书，常常各有三几篇评介文章在报章杂志（包括电台的文学节目）出现。电台的评论员认为：从比较严格的要求看来，一些评论文章“还无法做到全面的，深入浅出的批评，无法很好地引导作者进行更好的创作。”

当然，也有一部份书评是写得很不错的。例如发表於《青年知识》（星洲日报）的向阳的《略评“加薪”》，指出集刊“加薪”中的唯一短篇小说《分道扬镳》在塑造一个性格硬朗的工人（伊华）的形象时的缺点，就很有点启发作用。工人伊华对着他那两位久别重逢，但已放弃了他们童时的共同理想的总角之交说：“还不是这样过活，有一双手，肯做，总不至於饿死”，这的确是一种丧气话，表现不出在今天这个时代做一个工人的意义及其美好远景。而且所谓“有一双手，肯做，总不至於饿死”，在这个社会确也不一定是符合实际的。

星洲日报的《儿童园地》由本年中起对於许多篇幅较长的记叙作品，不时附有一段数百字的“短评”，其中有不少也可以当作文艺批评来读。这种在作品之后附加评语的批评

样式，早在战前就已出现於马华文艺报刊。其中以洪丝丝主编檳城的《现代周刊》时所设的“我们的切磋”做得最为成功。战后新加坡出版的《星洲周刊》，《知识报》以及香港的《文艺世纪》等刊物都有过类似的专栏。这對於提高作者读者的文艺修养以及一般的理论认识都有不少的帮助。现在《儿童园地》的增设《短评》，同样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少年儿童的习作与一般文艺青年的较成熟的创作在程度上有着一段距离，但也有着不少共同的问题，因而《短评》这一栏也就有其可供一般作者借鑑的地方。

譬如，對於一篇记叙姐弟以忍让息争的散文，短评指出了“对忍让要有正确的认识”——

“吵架的发生，总不免有原因，无风是不起浪的。能够找出吵架的真正原因，认真研究，必然会发现谁对谁错，或者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才能解决纠纷争吵。适当的忍让，态度的平和，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使问题不闹僵，使彼此可以协商讨论，不致各走极端。忍让并没有解决争端，没有除掉引起吵架的根由。因为，错误还没有纠正嘛。忍让一次，息争一时，过后，又会发生吵架的。只有深刻明白错误……改正无理取闹的作风，发扬友爱的精神，不要任性，不要自私自利，彼此互相照顾，那么……必然能和好相处的。文章對於这方面的道理，没有说清楚。还有，适当的忍让只适用於亲人朋友之间的吵架，并不适用於一切纷争，如同坏人的纷争。因为对坏人忍让，只有使他更猖狂的做坏事。”

（八月五日）

又如，有一篇作品描写一个贫妇遭遇车祸的悲剧，短评提出了“關於写车祸与不幸”的问题——

“小朋友们经常把人们的不幸与车祸聯繫起来，有时写贫苦的孩童，或乞丐，或老人，因生活艰难，神志不清，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结束了痛苦的生涯；有时写一家贫苦人家，日子已够难过了，偏偏家长又遇车祸丧生，生计更成问题了等等。这类事件在生活中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毕竟是意外事件，用来表现贫苦人家的痛苦和不幸，还是很不够的。因为现实中有多少没有遭遇车祸惨事的人们，仍然过着苦难的日子呵！可见造成生活苦的根本原因不在车祸这类意外事件上。……小朋友们不要迴避残酷的生活现象，不要把人们的不幸简单化，而要去多想，多问，多了解人们不幸的具体情况 and 原因。这样，才能认识生活的真实面貌。）（十月十四日）

像这一类的批评可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所指出的缺点不单存在於少年儿童的作文中，即在一些所谓成名的作家的笔下也是屡见不鲜的。

### 文艺史料

马华文艺史料今年来也受到比较广泛的重视，各个文艺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方面发生兴趣。《建设月刊》发表了古白记录，方修讲述的《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一九一九——一九四二）；世界书局继续印行战前作品的选本《马华新文学选集》（本年出版的小说集下卷篇幅增至三百页

)；新加坡中学教师会与南大毕业生协会则为庆祝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联合主办了一个“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阵线报的《旗》版及其姐妹刊物《新青年》又刊登了好些日治时期殉难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传略，包括写作人萧扬，叶金钟，作曲家杨励，叶立天等。此外，还有若干文坛回忆录之类在各报刊上出现，记述铁抗，李润湖，郁达夫……诸人的逸事。民报的《文摘》版也出了一两期《马华诗钞》，介绍了一批最早期的马华新诗作品。

然而，搞史料的人多了起来，货色自不免复杂了些，需要读者们多费一点甄别鑑赏的工夫，以防形形色色的走私主义。譬如今年出现的“苦衷论”，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位先生在他的一段回忆“槟城诗人”吴逸凡的大文中提出的。原文如下：

“记得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我在槟城新报主编诗歌周刊《诗草》的时候，得了他很大的鼓励和很大的支持。……不过后来竟有人批评，说他脱离现实。殊不知当年写文章，格於客观环境形势比人强，如果正视现实，万一出了毛病的话，作者和编者往往不免会遭逢‘不胜其烦’的麻烦，因此能够避免当然还是避免的好，谁愿意去找麻烦？槟城新报当年也有过这样的麻烦发生过。我进槟城新报的时候，已是雨过天青，但是报馆当局还是小心翼翼，再三嘱咐，最好还是少惹麻烦为妙；即使特约一些国内名作家撰述，虽然脱离现实，总比较省事得多。后来有个写有关马华文学史料之类文章的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言乱道，竟说什么‘这

些刊物完全不像是在南洋出版’的话，虽然这些都是后话。他那里知道当年作者和编者的苦衷？他又那里知道有这样难言的内幕？”

这位“苦衷”论者一方面声称人家批评他的这些刊物“完全不像是在南洋出版”的话是“胡言乱道”，一方面又在另一篇文章（回忆马宁）中一再说明他的稿源“大部份”来自中国——

“在三十年代的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槟城新报主编两个副刊。一个是诗歌专刊，名叫《诗草》，一个叫《热风》，是纯文艺刊物。《诗草》是周刊，《热风》也是周刊。这两个刊物的稿源，有大部份是邀约中国知名的文艺作家撰述的，一方面的用意无非是省事……。”

既然“这两个刊物的稿源，有大部份是邀约中国知名的文艺作家撰述的”，那么，说它们“完全不像是在南洋出版”，怎么会是“胡言乱道”呢？原来，所谓“胡言乱道”的指责不过是这位先生的一个假动作罢了；他的真正着力所在乃是推销他的“苦衷论”，也就是责怪后来的“写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的人不该太过直书不讳，不该没有原谅“当年作者和编者的苦衷”，不该没有替他们的“虽然脱离现实，总比较省事得多”的“难言的内幕”掩盖一番。

这真是马华文坛的怪现象：编的是马华文艺副刊，写稿的是中国作家（如彭成慧，何家槐等），理由则是“谁愿意去找麻烦？”这样子来做编辑，搞文艺，比起前人所谓要当兵当军医，要革命走后方的“安全”之道来，那又“稳当”

得多多了，绝对不会“万一出了毛病”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套“苦衷论”，大家都得原谅他的“苦衷”，不得据实直书，否则就是“胡言乱道”。

这种“苦衷论”如果进一步引伸开来，那更是妙用无穷了。譬如日治时期的帮闲帮凶，汉奸走狗，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你那里知道我的“苦衷”？你又那里知道我有“这样难言的内幕？”

不过这里也可以奉告这位“苦衷”论者几句：槟城新报当年曾有“麻烦发生过”，这并不是什么大秘密，每一个搞文学史或报业史的人都是知之甚详的。但情形绝对没有严重到必须把《诗草》和《热风》编得完全不像是在南洋出版。证据是：和《诗草》《热风》同一期间内在槟城文坛出现的还有许多副刊，包括槟城新报的《轮》，光华日报的《槟风》等等，这些刊物都不必由中国“作家”来撰稿，却也仍然与《诗草》《热风》一样的生存。特别是那个与《诗草》《热风》属于同一报章的《轮》，当时还走在时代的前头，集合了许多当地作者，如天白，力生，海风，艾狄，谛克等，在大力推行大众语运动呢。把同一时地，同一报章出现的副刊互相比较，就是评论这些刊物好坏的最客观的标准。你的“苦衷”还是拿去向太太倾诉吧。

### 詩文、戲劇

除了理论批评和文艺史料一类文字之外，诗歌和议论散文（包括杂文）的写作今年依然有较好的成绩。诗歌方面比

较热门的还是一些时事题材的作品，诸如追悼胡志明，支持亚非的民族独立战争，谴责尼逊总统的越战政策以及苏联的“帝国主义”的蛮横作风，讴歌美国日本各地人民的反战示威游行等等。这类诗篇以出现於一些小型报刊者为多。至於议论散文，则同时也散见於各日报的副刊。星洲日报的《生活》版和民报新闢的《每日一谈》专栏，都是相当固定的园地。作者有萧土，何止，岳文，陈之，鲁生……等。作品取材也很广泛，人情世态，社会问题，思想修养等等，都在谈论之列。有时也旁及文学艺术的问题；下面就是其中两则的节录——

“实际星马并不是没有文艺作品，而是整个文艺界缺乏出版条件。……几乎没有一份文艺期刊能维持到两年，有些只出一期便消声匿迹。……如果稍为注意文坛的话，近年的文艺作品，有些是向外流。文艺写作者外流是马华文坛上的习惯，不少文艺写作者忽然间远走高飞。……至於文艺作品外流，也并不是近年的事，早年新加坡的写作者就有把作品寄去香港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陈之。六月三日《每日一谈》)

“现在做学生可不容易。他们的境遇叫人同情，也令人可怜。大人们要做什么事，总叫学生带头，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应付。凡是坏事，总不忘记把责任推给学生……。不少文人，责怪学生太热心於会考，大热衷於文凭，而对课外文艺书籍不感兴趣。好像文艺书籍销不出，学生们得负一份责任似的。……这些指责与

埋怨，都是不公道的。学生们可要问这些文人和出版商这些问题：‘我们的教师，每天每时都在向我们强调会考第一，文凭重要，你们为什么不指责他们？……会考不及格，就不能升级，就不能深造，这不是我们学生规定的……’。”（鲁生。六月廿六日《每日一谈》）

戏剧创作部门（包括歌剧方言剧等），今年似乎也有不少产品。只是大部份产品都直接搬上舞台，不曾在报刊上登出。於是形成了今年的戏剧演出及表演艺术的一个特点：各团体演出的节目中，本地创作有了显著的增加；特别是在戏剧演出方面，本地创作的剧目差不多佔了一半以上。不过质量如何，却因多数未参观过，不敢置评。相信其中总不乏一些优秀之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在各报刊上发表，则今年的戏剧创作成绩，应该可以显得充实一些。（音乐作品曾见有《不屈的黄梨园》选曲一首，刊於《文艺生活》第二期）

此外，戏剧界的情形大致与去年相仿。新的剧团除了新加坡电视广播电台的新电剧团（本年四月成立）之外，似乎没有添上较重要的单位。一般演出方式则继续呈现分化状态，有不少节目，如醒华校友会的《红灯记》，康乐音乐会的“文艺晚会”等，都无法在市区的剧院欣赏到。

以下是今年来戏剧及表演艺术演出一览——

戏剧方面：

父母心——艺联剧团一月十三至十四日演出。

小城故事（袁俊）——南大剧团演出。三月廿二至廿四日。

禁止小便（陈白尘），婴儿杀戮（山本有山），终身大事——新加坡艺术剧场。三月廿七至卅日。

战斗中的孩子（方言话剧），歌唱马来亚（歌舞剧）——星岛左翼团体联合举办新春文艺晚会。三月（？日）。

美丽的家园（歌舞诗剧）——新加坡人民协会文娱工作团。四月十八至廿日。

慈母心，樑上君子，后台春秋——德明中学戏剧实验演出。四月（？日）。

过去的年代（王里著四幕话剧）——人民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十周年庆。四月廿六，廿七日。

玫瑰花的故事（清唱剧。梁荣平编作）——星市音乐会。五月廿一，廿四日。

都市流行症，临别的耳光，把国旗挂起来——圣约瑟华文黄昏中学。七月十九，廿日。

巷口（三幕话剧）——行动党例打支部。七月廿二，廿三日。

新加坡史诗（三幕歌舞剧，周粲，苗芒，钟祺作词）——行动党十五周年纪念。八月六日。

鬼域世界（陈伯汉作）——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研究组十五周年纪念。九月十一至十四日。

红灯记（话剧）——醒华校友会。九月十二至十四日。

新加坡二十四小时（歌剧创作）——新加坡电视广播企业。九月十七，十八日。

阿Q的悲剧（独幕剧创作）——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鲁

迅纪念晚会。九月廿五至廿七日。

生活的浪花（四幕话剧）——新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华语戏剧组。十一月十四至十六日。

普罗米修斯（诗剧创作）——表演艺术学院。十二月廿八日至一九七〇年元旦。

表演艺术方面：

三月——新加坡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合唱团“世界民歌演唱会”，人民协会合唱团暨铜乐队“音乐晚会：新加坡你多年青”。

四月——佳音合唱团“音乐会”，表演艺术学院“小红花——舞蹈简介”，新电播音企业“文娱大会演”，吉隆坡土著信托局工艺学院马来学生联合以华语演出“文艺晚会：巫华之夜”。

五月——星市音乐会“晨歌玫瑰音乐晚会”，南大周“文娱晚会”。

八月——国家剧场艺术团“音乐舞蹈会：一百五十年”。

九月——佳音合唱团“合唱音乐会”，人民协会“音乐歌唱晚会”。

十月——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儿童剧社“儿童文艺之夜”，康乐音乐会庆祝成立十五周年“文艺晚会”。

十二月——星市音乐会“欢庆十年音乐晚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稿）

## 一九七〇、七一年文艺新书编目

### 一九七〇年

小说——母亲（朱扬），灿烂的微笑（丁翼），生活的历程（雨川），沧海桑田（田流），我要活下去（孟毅），江城夜雨（方北方），人畜之间（苗秀）。

诗集——街头小唱（鲁生），马华新文学选集（诗歌，方修编），花串（张梦野，林也），贝壳（蔡欣），濛濛山野（潘有为），喷泉（秦林），鲜花、诗人（罗波浩），恋曲（初声），参差集（淳于汾），红睡莲（寒川），青铜代之歌（詹芜），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贺兰宁编）。

散文——人生百态二集（岳文），挣扎（鲁之羊），岛上杂谈（陈之），门外杂文（鲁生），探访外记（谢诗坚），生活的脚印（蓝玉），青春的飞翔（萧萌），瓜棚豆架（杰伦），海浪（巫汉明），读书与写作（章翰），语言浅论（越飞）。

剧本——过去的年代（王里）。

论文——事在人为（南海客），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方修)，新诗杂话（林琼），赵戎文艺论文集（赵戎），戏剧美术论稿（陈群）。

总集——响雷（彼岸），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孟毅），同窗集（游冬编）。

## 一九七一年

散文——无花集（洪浪），英雄的花儿（彼岸），人生百态三集（岳文），从东方到西方（黄枝连），生活的悲歌（晓奔），春灯黄卷（黄叔麟），梦呓集（云里风），林獬生政论集（林克谔），踪迹（周粲），隔靴的搔痕（曾炽豪），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方修编）。

诗集——幸福在哪儿（红桦），路（林康），晨城（流川），长春花（金琰），多风的早晨（周粲），马华新文学大系诗集（方修编）。

小说——底层一角（吴宜），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方修编），阿Q外传（丁翼），火玫瑰（东方月），雅会（于沫我），春冰集（韦晕），搁浅（泡蒂）。

戏剧——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方修编），乔迁之喜（叶苔痕）。

寓言——椰树的故事（学民）。

总集——鹰的话（谢雁），山岗的脚步（晨阳等）。

论文——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方修编），文艺创作的道路（孔武），木石集（长河）。

有关文艺读物——三岛由纪夫切腹丑剧（井田编），哲

学漫谈（章翰），人生观、职业与前途（章明），日军进攻星马画史（文史资料社）。

## 附一九七〇、七一年 演出劇目

### 一九七〇年

绞刑架下的中锋（四幕剧，南美名著）——新加坡艺术剧场。（二月廿七——三月八日）

三姐妹（集体创作）——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三月七日——八日）

宿舍风波、三块钱国币、火后（独幕剧）——德明中学戏剧会实验演出。（五月九日）

寒夜曲（三幕剧）——新加坡丽的呼声厦语话剧组。（六月十一——十二日）

连陞三级（讽刺舞剧，集体编写）——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七月十七——十九日）

悬崖（四幕剧，王里著）——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八月廿八——廿九日）

五奎桥（洪深）——圣约瑟黄昏中学戏剧研究会。（九月十八——十九日）

我们的青年（四幕剧，王里著）——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十月卅日——卅一日）

学府风光、巧克力糖、群醜现形记（独幕剧）——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学会。（十一月十四日）

醒悟（三幕剧，范经编导）——新加坡师训学院华文部戏剧研究会。（十二月十四——十五日）

## 一九七一年

《不夜城》（三幕话剧）——新加坡艺术剧场。（一月七日——十日）

年青人的晚会（讽刺剧《三个秀才》等）——新加坡儿童剧社。（四月一日——十一日）

文娱晚会（哑剧《街边》，独幕剧《同住的三家人》等）——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五月十七——十九日）

独幕剧晚会（《巧克力糖》，《剧团春秋》，《艺术与爱情》，《一个苹果就是一个世界》）——新加坡艺术剧场（九月二日——五日）

儿童话剧大会演（《雨季来了》，《装死的这回真的死了》等）——新加坡儿童剧社联合青年剧社。（九月十二——廿七日）

遊艺晚会（独幕剧《作家的悲哀》等）——霹雳文艺研究会。（十一月六日）

汉丽宝（歌剧）——吉隆坡剧艺研究会。十一月廿四——廿九日）

一九七一年度文艺晚会——（闹剧《心肝宝贝》，造型剧《迷失的一群》等）——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十二月廿六——卅一日）

## 一九七二年的马华文艺界

### 報刊、新書

今年来的马华文艺活动，以表现在杂志出版业方面比较沉寂，报章副刊次之，其他如新书印行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做出了一点小成绩。

过去一两年间出现的好几种较通俗的文艺杂志，今年初起已全部停刊，新问世的《联合》及《新生》，出了一两期以后，似乎也难以为继。目前仍在出版的约有文艺性的《茶座》，《蕉风》，《新社文艺》，《岛屿季刊》，《驼铃报》，《旭阳》，《南涛》，《年青人》（儿童剧社及青年剧社同人刊物，前身为民报《骆驼》副刊）……，综合性的《新加坡月刊》，《电视与广播》，《南洋教育》，《民众报》（人协），《奋斗报》（职总）……等十余种；其中除了一两种是新创的，余者大都已有相当的历史。吉隆坡马大华文学会的《大学文艺》闻已出至第四期，内容甚佳，惟此间尚未看到。

报章副刊方面，先后停刊的主要有南洋商报的《艺术》

(四月?)及民报的《朝花》(十月?)。此外有《文丛》和《新年代》等。至於星洲日报《青年园地》，《遊艺场》，《文化》，商报的《青年文艺》，《学府春秋》，民报的《学园》，新明日报的《新风》，《青园》，行动报的《青年笔阵》，阵线报的《旗》……等，都继续出刊。

联邦的若干地区性的报章副刊，本年似乎有更多的调整，结果是一般综合性的副刊更趋於趣味化或加用剪稿，武侠小说版也扩大了。文艺副刊在形式上仍保留下来的，我所见到只有两种——星报的《星艺》(周刊)和光华日报的《文艺》(周刊或双周刊，取代前此的《南斗》及《青年文艺》)。

新书的出版，今年上半年几乎是一片空白，见到的只有《盼望》、《马华社会史导论》……等寥寥数册，有的可能还是去年底印就的。幸好年中以后，收穫稍为丰富，《苍蝇集》，《风下杂笔》，《生活之歌》，《隔着长堤》……等一批诗文集，相继推出。世界书局出版的大部丛书《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四二)十巨册，经过了三年多的编印，也是到了今年下半年才全部出齐的。因而一年来的新书，凑集起来也有下列的三四十种，算是相当难得了。

小说——盼望(夏桦)，怒火渔乡(崇汉)，崩(雅波)，夜医生(年红)，红毛丹成熟的时候(魏萌)，新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苗秀编)，木屋区的故事(陈彦)，前车(于沫我)，喜事(于沫我)，旱风(梦平)，放声歌唱(凤妹)。

诗集——牧羚奴诗二集（牧羚奴），哭泣的神（谢清），生活之歌（丘克难），隔着长堤（马德），树和他的感觉（文恺），绿苔（石君），横鞭集（谢冰凝），风筝季（辛白），含笑的花（蔡迅），呼吁（絮絮），赤道鼓声（崇汉）。

散文，杂文——不屈的英灵（崇汉），落霞集（连士升），苍蝇集（李向），风下杂笔（林臻），挥手集（易非），园边集（林锦），安哥古迹（玛戈），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集（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赵戎编），闲思录（黄润岳），幸福的期待（符气南），踢含羞草的日子（石君），展痕（巫汉明），生活的图照（巫汉明），友谊之路（章明），港内杂话（陈之）。

剧本——三万元奖金（田流）。

评论——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一集（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史料集（方修编），中国新文学初步（李建）。

总集——知识道上（林抗、奔鸣等合著），菴施集（曹洁萍、雅芝等合著），哀伤的日里河（难明）。

其他有关读物——马华社会史导论（黄枝连），马华历史调查研究绪论（黄枝连），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符灵），华文第二语文教学论丛（翁世华），无所不谈集（洪锦棠），海角吟草（林蕴光）。

## 創作、評論

一年间出现於各刊物上的作品，读后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是一些较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和记叙散文；如反映浅海渔民、渡头船夫，割胶工人的暗淡的境遇，或者描写中下层社会互相扶持照应的好人好事，以及智识青年的落实生活，努力改造自己等等。前一类作品质量较好，但只有寥寥数篇。后一类作品则数量特别丰富，经常见於《青年园地》、《朝花》……等副刊中，如《红包》（岳典），《温情》（迅云），《矿场散记》（淑素），《无私之情》（文芽），《手足情深》（亦工），《一把斧头》（启文），《小梅的梦》……等是。这类创作的文字技巧大都还不很熟练，但题材新鲜，藉此可以窥见星马的一般社会现实或时代风尚，则是共同的特点。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倒有些较成熟的佳作，发表於《文化》、《青年文艺》、《新生》……等刊物上，不过新的作者除了垂仰等一两位外，一般上产量似乎不多。

若干团体举办的创作比赛，也发掘了不少优秀之作。星大中文学会去年底主办的一次，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前三名佳作共十余篇，已於今年初出版特辑；未及收入特辑的入选作品，也有部份在报章上披露，水平都很均匀。

新加坡青年协会及广播电视台今年各主办了一次，优胜也已揭晓，但尚未彙印成书。前者的小说部份笔者曾经读过，觉得其中《在白云间》，《街旁》（？），《崩》，《某种成长的过程》等篇，写得颇精彩。后者的与赛作品仅限於剧本，根据初步阅读的印象，笔者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不能再错》及《期望》……诸作。

马大华文学会也有创作比赛的举行，据悉共收到作品四百多篇，成绩与星大中文学会者相伯仲，惟评阅工作尚未完成。

理论批评文字，一年来见於各报刊者以书评估了较多份量，并且出现了好些新人，如瑶岗（谈夏桦的《盼望》），戈锋（《爱的教育》讨论会纪要），艾群（《一个青年的故事》读后），高湖（评《马华新文学大系》，再评《马华新文学大系》），杨刚（读《苍蝇集》），风沙雁（读李向的《苍蝇集》），吴心眉（评《木屋区的故事》），纪贞（评马德诗集《隔着长堤》）……等。其中吴心眉君因为批评了《木屋区的故事》一书，引起作者陈彦君的不满，在《青年文艺》上展开一场论争，参加者还有唐庚（《剖白》以后又如何），戎父（剖析《最后的剖白》）等多人。

關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本年有了若干突破。最受瞩目的是何戟在《青年知识》上提出的《木兰辞》的问题，认为木兰并不是历来一般文学论著所称颂的那么一个巾帼英雄，而是为拓跋族的北魏王朝卖命，对饥寒的穷民作战的醜恶形象。何君的文章掀起了一阵讨论的热潮，给予支持或补充的有亦工的《木兰诗的背景和内容的探讨》，《再说木兰诗》，汶划的《木兰诗的几个问题》，知隅的《也谈木兰诗》等长文多篇。

何戟的其他论文如发表於《文化》版的關於《岳阳楼记》、《艳歌罗敷行》等名篇的探讨，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文化》版的另一位作者蒋奎的《论屈原》，《论柳宗元》，

由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及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新书谈到屈原、柳宗元的思想局限，也是很出色的文字。同一副刊中最近又有林徐典博士的《先秦文学史稿》的陆续发表，就开头三两章的格局及其内容看来，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星马学人所撰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最详尽精当的一部。

此外，由於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所引起的波动，《青年文艺》副刊上也发生了一场关于杜甫以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论争，参加者有景云，王禹，安太，秋香，宜浙，李察，汉殷，林肇刚，王木青……等。笔者觉得若干反对郭沫若的论者，似乎有着一种误解，以为郭沫若以及本地一些推荐《李白与杜甫》这书的人都是锐意要打倒杜甫，因而汲汲於起来为杜甫鸣不平。实际上大家祇是要摘去历来一般人加於杜甫身上的“人民诗人”这个不恰当的称号，还给杜甫一个真实的面貌而已。今后杜甫虽然不被认为人民诗人，但仍然不失为一位技巧成熟的唐代诗人。

### 戲劇、劇評

戏剧及表演艺术方面，有几个特点可以一提。其一是大专学生从事表演艺术工作比过去活跃了些。星加坡大学、工艺学院、马来亚大学等中（华）文学会，今年就先后举行了好几次盛大的文娱晚会，马大华文学会的同学还出发到南马各地作巡迴表演。有位剧评作者曾为文讚颂这种可喜的现象，认为这类健康的文娱活动将会擦亮了大学生的眼睛，使更多的大学生摆脱了象牙塔的桎梏而直面人生。（谭小观：

《看星大中文学会的演出》)

其次是新的戏剧团体的陆续增加。实验剧场,生活剧社,南方艺术团等,都是最近一两年间才成立的新进剧团,有些演出还是属于实验性质,假英国文化馆等小剧场举行。过去好些比较活跃的剧团,近年来有的不复存在,有的缩减演出,现在这些戏剧界的生力军的相继诞生,补替遗隙,也可以说是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

其三是一般演出以音乐、舞蹈、及诗歌造型佔多数,戏剧的献演相对减少,多幕话剧更几乎成了绝无仅有。原因不知道是由于戏剧的排练比较麻烦,还是其他的表演艺术格外发达,反而后来居上?照说这该是不大均衡的发展。我们希望几个向来以演剧见长的较有历史的团体,如艺术剧场等,能多推出几齣好像《绞刑架下的中锋》那样的大型戏剧来。

以下是一年来有关戏剧较重要的演出一览,我们可以看出各团体所推出的多属一些文娱晚会,若干独幕短剧是附在这类综合表演中出现的。

独幕剧晚会(罪根,第二街,人约黄昏)——新加坡联艺剧团演出。(一月六日——九日)

春之声文娱晚会(附独幕话剧《醒悟》)——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文艺辩论戏剧学会。(一月廿三——廿五日)

《春到人间》文艺晚会(附讽刺短剧《青年画家》——儿童剧社,青年剧社联合演出。(二月十二——廿三日)

迎春观摩晚会(附独幕剧《乒乓风波》,《阿兰要活下去》,陈念红,叶丰分别创作)——新加坡实验剧场。(二

月十九——廿日)。

儿童话剧晚会(《自动小火车》，《进攻弱点》，《一件有益的事》，《要为大家想得多》)——儿童剧社，青年剧社。(四月十三——廿二日)

花为媒(歌剧)——人协文工团舞蹈组。(四月廿二——廿三日)

夫妻桥(中国川剧改编)——人民协会文工团。(五月八日——十一日)

可疑的人物(南斯拉夫名剧)——新加坡艺术剧场。(五月十八——廿一日)

《春自人间来》文娱观摩会(附短剧《街头一角》，《为谁争气》)——马大华文学会主持，劲松艺术研究会，南益校友会，雪华机器工会等参加节目。(四月卅日——五月五日在吉隆坡演出。八月间南马巡回表演)

文娱观摩舞会(附朗诵剧《无名河哼哀歌》)——生活剧社。(六月三日——四日)

文娱晚会(附短剧《谁是自己人》，《夜市风云》)——星大中文学会为中华留医院义演。(七月廿二——廿三日)

文娱晚会(附集体创作短剧《评选队来了》，《种菜人家》，《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七月廿九日)

文娱晚会(附朗诵剧《永恒的生命》)——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十八周年纪念。(十一月廿一日)

生活文艺晚会(附五场话剧《可敬的亲人》)——南方

艺术团。（十二月廿七——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

除上列演出外，较纯粹的表演艺术的献演则有下列多场

星马华乐家联合主催麻坡“华乐欣赏会”。（二月）

新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学生组“文娱观摩晚会”；新加坡广播电台华文组“电台音乐会”，国家剧场艺术团华乐组“丝竹乐欣赏晚会”；黄埔中学諮詢委员会主办“黄埔之夜”。（三月）

星市音乐会“五月歌乐会”。（五月）

新加坡工商校友会艺术团吉隆坡演出“歌乐晚会”。（六月）

赤道艺术研究会庆祝舞蹈组成立十七周年“文艺晚会”；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主办“民谣歌剧选曲”。（七月）

马来亚汽车银业公会筹募福利基金“遊艺晚会”——吉隆坡沙叻秀新村学校，雪州琼联剧社合唱团，茶阳会馆康乐部，茶阳励志社合唱团，巴生路青年会等参加演出；新加坡德明华文中学“歌剧舞蹈音乐晚会”。（八月）

艺术剧场“江河在奔流”音乐舞蹈晚会；人协文工团“民众文娱”巡回演出；雪州琼联剧社合唱团“音乐舞蹈晚会”。

李豪合唱团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新加坡女体育教师会十周年纪念“音乐体育示范晚会”，巴生路青年会主办“全国民间舞蹈观赏会”。（十一月）

国家剧场华乐团，合唱团“鼓乐歌声到民间”巡回演

出，国家剧场俱乐部五周年纪念游艺晚会，工商校友会主办“星马艺术歌曲歌唱比赛”。（十二月）

虽然戏剧的演出相对减少了，剧评以及一般戏剧理论文字在量上却还相当可观，发表的园地包括星洲日报的《游艺场》，南洋商报的《艺术》版，民报的《朝花》副刊，以及各团体的演出特辑或纪念特刊，如星大中文学会为中华留医院义演特辑，生活剧社成立周年纪念特刊等。在这些文章中，本地剧本与外国剧本的问题又再度被提出讨论，而且有了相持不下的趋势。譬如艺术剧场《可疑的人物》演出特辑中的《我们的话》，与《朝花》副刊上郑义的《可疑的人物观后杂记》，就很有点针锋相对的样子。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上演真正的本地剧本，提高本地的剧作艺术，永远是本地戏剧工作的主体。但真正的本地剧作的上演事实上确有诸多困难。有些剧团有条件克服这些困难，无疑地应该以发展本地创作为努力的重心。另外一些剧团因为局限较多，无法克服面对的困难，生怕“把道理讲歪了”（艺术剧场《我们的话》），于是倾向於排演某些较优秀的外国剧本，也是未可厚非的。总之，演本地创作还是演外国剧本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剧团该是可以酌量本身的条件来处理的。

重要的一点是，演外国剧本就应该演得像外国剧本，演本地剧本（包括由外国剧作改编者）也应该演得像本地剧本。最好避免含混不清，以致观众不知道舞台上究竟是在搬演怎样一个地区的故事。这会使得观众失去真实感，削弱戏剧的教育作用。儿童剧社和青年剧社一两年来联合演出的若

干独幕剧，就有这么的一种情形。正如一位作者针对该社今年演出的《自动小火车》等四个剧本所批评的：四齣戏不论在故事情节，台词、或舞台佈置上都无法告诉我们事件发生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人物服装有的是色彩明朗的 新 社会装，有的是剧社的制服，有的又穿星马社会常见的便装。台词中有不少进步的语言，看来好像是在某一个外国的社会，然而再看那些中等家庭的佈置，以及孩子们锁门防盗的台词，却又不像。（小群：《对四个独幕剧提点意见》）笔者去年看了该社的《雨季来了》一剧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迷惘的感觉，一般观众印象也许差不了多少。这种缺点似乎是来自对於外国剧本的不适当的改编，今后只要在剧本编写方面稍予留意，相信会很容易纠正过来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 一九七三年的马华文艺界

### 報刊、新書

一年来的马华文艺界，基本上是继续着去年的消沉的趋势。副刊杂志的出版续趋下游，新书的印行也松弛了些。只有戏剧及表演艺术仍勉强稳住阵脚。

报章副刊及杂志，开年以后宣告停刊，或出了一个短时期之后终于中止了的，有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民报的《椰风》（代替《学园》），南涛（第二——三期），旭阳（第三期），年青人（第三期），《茶座》，阵线报的《旗》……等。今年下半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纸荒现象，副刊和杂志的出版情形又略有不同。由於各家报章的缩减印刷张数，副刊首当其衝，有的完全停刊，有的一再削减篇幅，以至有时一连十多天见不到半个文艺版。到了年底，情况才比较改善了些。目前的情形是：性质较纯粹的文艺性副刊，或剪稿较少而兼登部份文艺创作的综合性副刊，有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星云》，《文化》，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取代《青年文艺》。联邦版改为《读者文艺》），星报日报

的《星艺》，光华日报的《文艺》，新明日报的《青园》，《新风》，行动报的《青年笔阵》……等少数几个。篇幅多数是每周半版至一版，稿件以诗歌、散文及简短的小说为主。其中以《青年园地》的内容稍为结实些。但较有份量的作品，便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了。

杂志方面因为印数少，受到纸荒的影响比较轻微，所以反而显出一点回弹的力量。《星光》，《劲草》，《山花》（集刊），《知识天地》，《文娱画报》，《社会知识》（吉隆坡）……等新刊物，由年中起先后创刊。此外还有《新加坡青年》，《里程碑》，《前卫》，《蜗牛》……等。原有的若干定期刊物如《新加坡月刊》……等，刻仍照常出版。吉隆坡的《大学文艺》则出至第五期，南大的《新生》出至第四期。其他如星大中文学会的《会讯》，《快讯》，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的《艺讯》，马大华文学会的《迎新手册》，《学习》，星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世界》等，今年也都有些文章可看。学生刊物则有《立化学苑》，《绿野》（黄埔）……等。

但新创刊的杂志虽有好几种，刊期却很稀疏。《星光》一年间出了六期，算是成绩最好的，余者大都各得一两期而已。加以其中一部份是属于综合性的，总的看来吸收的稿件并不多，抵消不了副刊方面的损折。

新书的印行在年初至年中一度稍形活跃，但嗣后就渐呈迟滞，大概也是受了纸荒影响（印费提高）的缘故。各大书局一年间在这方面完全留下空白，也是今年本地文艺书籍出

版业的一个退化。但一般说来，成绩还算过得去。最大的特点是一些有着相当写作历史而作品迄未彙印成书的作者，已开始有了集子出版，如谷亮的《听雷集》、心群的《打靶集》、理武的《艺术创作与批评》、李擒白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高阳、庸夫的《生活诗钞》……等都是。其次是读书界对于一般新书的反响还颇良好，如《小岛醒了》（尤琴）、《苦难的航程》（马德）、《碎金集》（洪浪）、《风暴》（李向编）……等，都有人特别撰文评介。

下列是个人一年间搜集到的新书编目。其中有少数是去年出版的。今年的出版物则有若干因未及见到而没有列入。

小说——家福（驼铃），小岛醒了（尤琴），爱，在远方（丁翼），查米（杨朴之等），火把（范北羚），狂风暴雨（魏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孟毅编），星马小说佳作选集（南大学术人员协会编），醉了，芒草（谢清），白天的月亮（子木），豹变（萧遥天）。

诗集——生活诗钞（高阳、庸夫），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李擒白），苦难的航程（马德），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周粲编），梅诗集（梅淑贞），会飞的玻璃球（周粲）。

戏剧——灯火万家（江宏），第二次奔（艺术剧场），差一点落伍的人（王里），巷口（王里），关新艺电视剧集（关新艺），三个生活故事（南方艺术团朗诵剧脚本）。

散文、杂文——俯拾篇（松台、岳典），风暴（李汉添等），长夜集（方修），听雷集（谷亮），碎金集（洪浪），

打靶集（心群），填鸭（完颜藉），点线随笔（歹羊），探访二集（谢诗坚），五色喷泉（周粲），向阳的生命（梁誌庆），青春的痕迹（艾雁），中国行（芝青），星马散文佳作选集（南大学术人员协会编），蛰居集（巫汉明），行隐集（黄笃修），冰谷散文（冰谷），泰国行（南大中文系文化考察团）。

论文——批判苍蝇集（李向编），艺术创作与批评（理武），文艺学习与文艺评论（章翰），流川论评集（流川），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苗秀编）。

总集——一九七二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特辑（马大 华 文 学会），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专辑（新加坡青年协会）。

其他有关读物——纽西兰近事（黄寒秋），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章翰），朋友之间（章明），中国语文散论（周清海），文心雕虫（许云樵），新加坡华文报业史（郑文辉），四大传奇及东南亚华人地方戏（王忠林，皮述民，赖炎元，谢云飞），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柯木林，吴振强编），华文教学论文集（周国灿），新加坡沦陷三年半（冢崎护），吟香诗集（马宗芎），报业考察团特刊（新加坡 报 林 俱 乐 部）。

### 創作、評論

一年间文艺创作的新产品，量方面固然相当贫乏，质方面也比较平淡，但仍有几点值得一提。

一，一般新人的创作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志工，

吴垠，林上泉，章钦，洪忠，罗樱，劲翔，秦林，刘吟，陈岗，蓓蕾……等，大都有若干较成熟的作品出现。

二，集体创作似乎逐渐形成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发见好些作品，如《大学文艺》的《两姐妹》，《辩论会》，《文娛画报》第一期的《手》，艺术剧场的小丛书《第二次奔》……等等，都是众多作者的智慧的结晶。在专业的、熟练的写作人还很缺少的此时此地，这种集思广益，合力加工的创作方法，无疑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

三，文艺创作比赛续有新的收穫。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参加的作品多至数百篇，得奖名单於十月底发表，录取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各种体裁佳作约四十篇。其中的一部份笔者曾获得先睹的机会，觉得较之一般副刊杂志所载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原因，大概是参加比赛较之投稿报刊，在形式及内容方面都少些拘束，有利於作者们充份发挥他们的才能。

马大华文学会举办的一九七二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结果也於今年二月间公佈，部份优胜作品且已印成特辑，销行甚广。

同一类的活动，今年还有霹雳和丰兴中校友会主办的“全国华文散文创作比赛”，霹雳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小说创作比赛”，南大学术人员协会暨教育出版社的“联合徵文”，新加坡岛屿文化社举办的“星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等等。其中“联合徵文”已於四月初揭晓，入选作品计小说九篇，散文十六篇，均已彙印出版。

理论批评方面，今年所见的几乎祇是一些本地的创作文集或单篇作品的评论。经常执笔的有林弋（《关于文风丛书查米》，《评长夜集》），吴心（《浅评三轮车夫》，《浅评黄昏之献》，《评介苦难的航程》），莊君（《评·女人》，《谈我的十七岁》）……等几位。一些不属於新文艺范畴的新书或论文，也不时引起批评。如悠漫、吴犹、李金泉等的评纂崎护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郑良树，林肇刚的评《四大传奇及东南亚华人地方戏》，白苹，求知者的评石斋的《填词不必照谱》的论调……等是。

关于词与词谱问题，曾经导致一场小小的论争。事缘石斋君在星洲日报的《文化》版发表了一阕《一斛珠》的词，形式上较词谱多了七个字，经白苹君为文指摘之后，石斋君始终坚持其填词不必照谱，字句可以任意增减的主张，而且认为这是古已有之的。但求知者，半岛等作者，都支持白苹君的意见，认为必须照谱填词，凡字句有所增减，则须加以注明，诸如减字，摊破之类。

笔者以为词与词谱的关系，代有演变，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唐代至北宋；二，北宋至南宋；三，元明清至现代。第一个时期是词调大批创造的时期，文人按歌填词，一首乐曲常常填成好几种字数句法互不相同的样式。因为作者们所根据的是旋律节拍，可以每一个音符配一个单字，也可以好几个音符共用一字，还有延声，过门之类，有时拖了好多个拍子，填写的字数句法就更有伸缩性了。石斋君所谓填词可以任意增减字数，不必注明，古已有之，倒也

没有说错。但到了第二个时期，词调多了起来，差不多足够词家选用来创作，於是各种慢调小令，渐成定格，偷声减字之类，多有注明，要不然就由作者自製新词、自度新声，如姜白石的《暗香》《疏影》等等。及至第三个时期，乐曲（旋律）多已散佚，词谱大量编出，词已变成了一种古典格律诗，如果再以“古已有之”为理由，採用旧词牌填词而坚持不须照谱，那就说不过去了。然而白苹、求知者诸君的文章，有些地方解释得不清楚，说服不了石斋君，也是事实。

### 戲劇、表演藝術

戏剧及表演艺术方面，今年有两项可喜的现象。

其一是联邦各地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似有上升之势。四月间马大华文学会在吉隆坡举行《春自人间来》大汇演，参加演出的团体多至二十个，比起往年来可说是一个大进步。还有一些比较僻静的村镇，如土姑来，士毛月，和丰，江沙，哥踏峇汝等地，许多团体也起来积极搞演出或参加筹募独中基金义演，同样形成一个小热潮。有关演出的批评，似乎也增加了不少。星洲日报《遊艺场》副刊（年底停刊）以及新出版的《文娱画报》，都提供了相当的版位来发表剧评，鼓励剧运，作者有风雷、干将、跬步……等。

其次是本地剧的演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新加坡艺术剧场的《第二次奔》，《蛆虫》，实验剧场的《苦难的航程》，……以至马大华文学会的《春自人间来》大汇演中的好些独幕剧，就都是本地创作的新剧本。其中以《第二次奔》

的演出最受注目，因为它显示了艺术剧场的一个新的动向。

有的论者批评道：“五场话剧《第二次奔》并不是剧场的第一个反映本地现实生活的多幕剧，但却是剧场第一次成功获得上演的多幕剧创作。从内容来看，这对于剧场，或是对于整个剧坛来说，都是一个成功的突破。该剧本第一次把矿工的生活形象具体地搬上舞台，扩大观众的视野，瞭解同胞水深火热而又生动感人的生活事迹。……尽管这个话剧的演出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谁也不该否认这是一个立场鲜明，主题思想正确的剧本，是一个成功的演出。”（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文艺晚会”演出特辑，唐河：《看第二次奔联想到剧评者及受评者之间的一些问题》）《第二次奔》的剧本最近也已整理出版，列为艺术剧场丛书的第一种。

兹将一年来各团体的演出活动，简誌如下。

戏剧演出——

吉隆坡琼青舞蹈团：“春之舞”文娱晚会（包括短剧《父与子》、哑剧《出路》）。一月十九日——廿一日。

新加坡圣约瑟黄昏中学戏剧会：五幕古装喜剧《鸳鸯帕》。一月十二——十四日。

儿童剧社、青年剧社：“百燕迎春”文娱晚会（舞剧《布朗寨上的号角》，童话剧《四位好房客》）。一月卅一——二月廿五日。

柔佛士姑来青年会：“我们青少年”文艺晚会（话剧《工场上》）。二月。

新加坡实验剧场：《苦难的航程》音乐、舞蹈、诗剧晚

会。三月二日——七日。

艺术剧场：五幕话剧《第二次奔》。三月廿八——四月一日。

马大华文学会：《春自人间来》大汇演（话剧《十亩地》、《我们要生活》等），四月九日——十五日。参加演出团体：福州会馆，劲松艺术研究会，茶阳励志社，循人中学校友会，尊孔校友会，南益校友会，勇进口琴重奏团，雪州中华童军团，中国公学校友会，增江青年会，吧生南安会馆，吧生路青年会，兴华校友会，巴生新韵音乐社，安邦新村学校校友会，安邦学校校友会，安邦新青年，双溪威青年俱乐部，沙登新村中学校校友会。

马大华文学会：北马巡回演出。四月廿三日——五月七日。行程包括安顺（冷甲华侨校友会主办），怡保（霹雳福建公会主办），邦咯，江沙（华联校友会主办），太平（艺群音乐社主办），檳城（韩江校友会主办），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主办）等地。

新加坡生活剧社：文艺晚会（短剧《路》，《四亩地》，《月起》）。四月廿五——廿九日。

儿童剧社，青年剧社：《六月话剧欣赏会》（《她有资格当演员》，《婴儿杀戮》，《东郭先生和狼》）。五月廿七——六月十四日。

工艺学院中文协会：文艺晚会（短剧《两姐妹》，《意外事件》）。六月十九——廿二日。

劲松艺术研究会：“劳动心声”文艺观摩会（短剧《提

防陷阱》，《茶档》，《一件小事》)。六月一日——三日。  
参加演出团体：马大华文学会，沙丁新村校友会，安邦新村校友会，安顺三民校友会。

怡保韵清合唱团庆祝十五周年演出：幸福生活万年长（歌剧），六月十六日。

金马士康乐促进会：文艺晚会（话剧《土地》，诗剧《幸福》）。七月十五日。

新加坡海星中学：歌舞剧晚会（讽刺剧《心理学家》）。七月廿七——廿九，八月廿五——廿六日。

艺术剧场：蛆虫（三幕讽刺剧）。十月九日——十四日。

国家剧场十周年纪念演出：灵芝姑娘（三幕歌剧）。十月十五——十六日。

艺联剧团：独幕剧晚会（《摊前风波》，《爱民如子》，《颠倒众生》）。十月卅一日。

南方艺术团：生活文艺晚会（小舞剧《建筑工人》，《胶林里的故事》，小歌剧《巴杀小唱》，白榄剧《一件小事》。）十二月廿三——廿九日，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十三日。

表演艺术——

新加坡国家剧场：音乐晚会。一月十九——廿日。

人民协会文工团：“草原之歌”文娱晚会。一月五、八、九日。

文化部主办：迎春音乐会。二月十八日。

佳音合唱团：圣乐晚会。三月十一日。

文化部主办：大众音乐《民歌妙舞》。三月十八日。

表演艺术学院（七月起改为实践艺术学院）：学习音乐会。四月十七——廿一日。

义安工艺学院：文娱晚会。五月十二——十三日。

教师合唱团：演唱会。五月十五日。

佛教总会：庆祝卫塞节遊艺晚会。五月十七日。

文化部，国家剧场联合呈献：民族舞蹈之夜。五月廿三日。

士毛月青年俱乐部：文艺晚会。六月十一日。

新山琼青海音合唱团：“我们这一群”文娱晚会。六月一日——二日。又六月十六日：为永平独中义演。

新加坡女体育教师协会，精武体育会，南侨女中：“为善最乐之夜”慈善晚会。六月五日——六日。

国家剧场、人协合唱团：“歌唱和平与友谊”大合唱晚会。六月廿三——廿四日。

广播电台华文组：电台音乐会。七月一日。

星市音乐会：歌乐晚会。七月十四——十五日。

国家剧场：“鼓乐歌声到民间”。七月廿日。（参加南大迎新晚会演出）。

筹募人民奖学基金义演：人民芭蕾舞之夜。七月廿八日。

吉兰丹中正校友会：文艺晚会，九月七日——八日。

新加坡公教中学音乐协会：音乐晚会，九月八日。

李豪合唱团：华乐民歌之夜。九月廿二日。

大众音乐二周年纪念音乐会。十一月十一日。

国家剧场俱乐部二周年庆祝艺晚会。十二月十四日。

教育部属下青年音乐协会主办：五校联合音乐会。十二月十九——廿日。

中艺民族乐团周年纪念演出：民族乐器观摩会。十二月十六日。

又：星洲日报今年来赞助或主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其中与新文艺较为接近的是六月廿四日举行的“全国现场绘画比赛”。参加比赛的青少年达二千余名，盛况空前。相信明年将会扩大活动范围，做出更好的成绩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 一九七四年的马华文艺界

### 副刊、雜誌、新書

一九七四年的马华文艺界仍旧是平淡地过去。副刊杂志的出版，创作批评的活动，都不大活跃。新书的印行虽有力争上游之势，成绩也不显著。比较热闹一点的还是戏剧和表演艺术的演出。

报章副刊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动。刊期不太稀疏，经常可以见到一点本地创作的，有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文化》，南洋商报的《生活》，《新年代》（联邦版为《读者文艺》），星报的《星艺》，新明日报的《青园》，《新风》，行动报的《文化天地》（上半年为《青年笔阵》），民众报（周刊）的《艺园》，《文化》……等等。

杂志方面停刊的似乎不少，计有《星光》，《里程碑》，《前卫》，《文娱画报》，《社会知识》，《山花》（集刊）等六七种。新创刊的祇有《乡城文艺》一种，出了两期。此外就是两本集刊：《伐木场的来信》（生活文丛）和《树

胶花开的时候》(椰林丛刊)。就今年的情形看来,刊期保持稳定的出版物,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出版历史较久,或经济基础较好的,如《电视与广播》,《新加坡》月刊,《新加坡青年》,《展望》,《教师杂志》(吉隆坡),《石叻周报》(文艺作品甚少)……等。另一类是一些专业人士的同人杂志或大专学生团体的喉舌,如《知识天地》,《蜗牛》,《劲草》,《新生》(最近似已改组,代以《北斗文艺》)……等。

另有一些油印的,或不必面对销途问题的会刊,会讯,学报之类,也是可以维持的,诸如《春雷文艺汇演快讯》,《学习》(永平中学圣约翰救伤队),《绿野》(黄埔中学),《星座》(德能中学),《青年组讯》(牛车水区民众联络所)……等等。

新书出版,今年倒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先后出现了好几个新的出版社,成为文艺出版业的生力军。一年间的本地文艺新书,有一小半就是这些机构提供的:如万里书局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方修);新知文化企业的《人生百态四集》(岳文),《两姐妹》(齐思),《我们是一家人》(马生);洪炉出版社的《轻评浅介剧与画》(文烽),《我要阳光》(尤琴),《登高吟》(常追风),《开弓集》(贺天),《短刀集》(吴蒙);四月出版社的《南飞的箭》(马田),向阳文化企业公司的《生命的艰途》(高澈),而今出版公司的《在宿舍里》(冬琴)……等都是。星加坡中学教师会也可视为一个新的出版单位。该会今年与教

育出版社合作，开始编印《中教文艺丛书》，已出版者有《你是纯洁的》（姜凌），《美丽的国土》（杜诚）……等。

其次是香港的若干出版社，今年也较积极地参与本地的文艺出版工作，先后印行了好几种单行本；如中流出版社的《忆农庐杂文》（高湖），《轻尘集》（方修），广宇出版社的《日本行》（芝青）等。七十年代丛书《繁花集》（文丝），《我的外国朋友》（潘骏）等，似乎也收入了一部份星马作者的稿件。

但总的说来，一年来出版的文艺书籍，数量上却也没有太大的进步。笔者个人搜集所得，是三十五种上下：

总集——成长（星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三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当我寂寞的时候（梁鼎新），砂砾集（风沙雁）。

小说——照顾（李向编），你是纯洁的（姜凌），网（王梅总），风雨之歌（思远），在宿舍里（冬琴），金光道上（崇汉）。

诗集——无根的弦（英培安），南飞的箭（马田），美丽的国土（杜诚），母亲，我的亲人（红白），登高吟（常追风），生命的艰途（高澈）。

剧作，演出脚本——两姐妹（齐思执笔），我们是一家人（马生执笔）。

散文——里程集（纪铮），难忘的日子（蓝玉），梦外集（陈世能），安先生的世界（英培安），人生百态四集（岳文），忆农庐杂文（高湖），轻尘集（方修），日本行（

芝青)，大陆行（张逸凡），我要阳光（尤琴），开弓集（贺天），短刀集（吴蒙），不照镜子的人（林一飞），都市人语（孟沙）。

论文，史著——轻评浅介剧与画（文烽），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方修），马华剧运的话题（慧音）。

其他有关读物——年青人的问题（章明），心理问题漫谈（章明），开埠前的新加坡（郑文辉），今后华教何去何从（陈初荣），刘天中诗词集（刘天中），牛了漫画集（牛了），朝向明天（叶钟铃译），东亚，东南亚教育论集（星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编），汉语音转学（戴淮清），第三世界兴起的新纪元（半岛）。

### 創作、批評、論爭

一年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较有深度的反映生活的创作好像是更少了。但新的作者的出现似乎仍不绝如缕，描写都市景物或农村风貌，都有些新鲜的题材。祇是产量不丰，好些新人几乎都是昙花一现之后就见不到他们的第二篇文章。这也许是由于大家的署名都还不大固定，或者文艺园地窄小，作品刊出的机会本来就不多的缘故。比较常见的则是在《青年园地》，《生活》等副刊上发表短文或小诗的几位，如葛凡，伦欣，吴亮，高山青……等。

一些为读者所熟知的作者方面，英培安的风格似乎有了改变。他在《安先生的世界》序中自言：“诗仍旧在写，创

作观倒逐渐在变了。要挣扎出以前颇为得意的形式和语言，要跳出几个优异读书人互相恭维讚赏的贵族框框，良非易易。以前的包袱着实太重了，一提起笔桿总是冤魂不散。……惧於破的人，就绝不能立，断臂之痛固难忍，而这种痛，却是一个有原则，肯思索的创作者所必需的。摔掉以前的士大夫式的水晶玻璃罩与紫坛书架子，原有的一班文友，恐怕都被吓坏了，说不定从此变成怒目而视的敌人，也很难说。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事实”（《生活》版）。再看他最近的一两首诗作，虽然仍未能完全摆脱那种贵族式的诗人的矜持，但内容确是平易近人得多了。

参加某些徵文比赛入选的作品的出版，也算得是本年的一份文艺创作的成绩。星大中文学会印行了一册《成长》，内收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种样式的作品二十余篇，都是该会主办的一九七三年度星马文艺创作比赛的得奖佳作。一九七四年度的文艺创作比赛（星马性）则有马大华文学会主办，料已截稿，成绩最近可公佈。

侧重鼓励小说创作的，则有吡叻文艺研究会和星加坡岛屿文化社。前者主办的去年度全马文艺小说创作比赛，於本年二月举行启封仪式，录取公开组及学生组的佳作约二十篇。后者举办的星马港小说创作大比赛，於今年六月揭晓，星马两地入选的作品共九篇。

理论批评方面，本年以有关戏剧及表演艺术的创作或演出的评论占多数。其中有专论剧本的，如士妮和于先普的《评灯火万家》；有批评演出的，如一观众的《对南方艺术团

演出的一些意见》，凌沥的《五月话剧晚会观后》；也有检讨一般演出成绩以及演出与批评的关系的，如涓滴的《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山丹的《当前表演艺术活动的几个问题》，微言的《关于演出与批评》等。一般论者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时还颇参差。譬如对于目前表演艺术活动的发展，有的是完全肯定的，有的则认为“仍要时刻注意，要避免表演艺术的过度发展，形成不健康的现象”，“应该时刻强调每个人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学习讨论有关政治，经济等重要问题，多做群众工作”（山丹）。又如关于演出与批评的问题，似乎也有多种不同的意见。

有关文艺或学术问题的若干论争，也占去了各报刊的一些篇幅。其中较受瞩目的有贺天和许永顺的关于《一九七三年度新马文坛动态》（许永顺）一文所引起的论争，黄葆芳，黄崇禧，田新亚等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对楹联的起源是否无知”的论争，崔贵强和林肇刚的关于东南亚历史研究问题的互相诘难，何戟和陈初荣的关于“现代华语拼音”问题的往复驳辩……等数宗。

笔者个人觉得，大部份的论争，双方的歧见其实并不太大。还有一些争执如关于“先生”和“老师”的称呼之类，更是大可不必的。真正显出原则性的歧异的，祇有何戟和陈初荣的对于拼音文字问题的一场辩论。这和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文坛的关于“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的论争的性质相当接近。何戟所支持的“汉语拼音”，乃是“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个跃进，但主旨仍然还是要用拼音字来拼写现代

语言，它要求准确，精密，规范化，但不能流於繁琐难学。陈初荣所提倡的“现代华语拼音”（初时称为“新华语拼音”）：则是当年的“国语罗马字”的发展的极致；原理仍旧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马罗字”（鲁迅语），祇是办法较之“国语罗马字”更加繁复琐屑。“国语罗马字”分四声，“现代华语拼音”不但四声有不同的字母，同声的字之中还有不同写法，此外又有词性不同的拼法（或者说是花样繁多的分词连写的变化）。这就是论争的根由了。

笔者个人赞同何戟的意见。何君指出：陈先生是“先有汉字的存在认识，然后制造拼音文字”。又说：“将来纯粹用拼音来书写语言，这些语言当然有其定型化的词意，但并非先有汉字的形象和概念，才来写出拼音。因此，拼音文字须直接可以念出它的音调，不是穿插代表其词性，四声等形状，使人望形生义”。至於“汉语拼音”，虽然有些词儿看来有相同的拼音字母，“但文字不是单看一二词儿来会意。纵使用汉字读出，有时也不是单听一二词儿的音调就会意。当组成句子念起来，可就顺利了”。

但陈先生在文字改革运动方面，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如果能够把他的才能投入当前的中文拼音化的主流——《汉语拼音》的推行工作中去，相信他会获得百倍於三二十年来提倡“现代华语拼音”的成就。被细碎的拼音规则所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难学，脱离群众的文字的“国语罗马字”，确是老早就被时代抛弃了。比较“国语罗马字”尤为繁琐难学的“现代华语拼音”，当然更加的没有前途。汉语拼音文字

已经成了中文拼音化运动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汉语拼音”已被广泛採用，日本人热烈地在学习，星加坡的学校也有教学。联邦将来如果接受中文拼音化，大势所趋，相信也是选择这个“汉语拼音”方案的。然而，尽管如此，从“汉语拼音”到“汉语拼音文字”的普遍使用，还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漫长的过程。陈初荣先生以其关于拼音化工作的丰富经验，是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其实，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是汇合了无数人的智慧，集思广益而制定的。参加设计或提出意见书的，有欧美各国的汉学家以及华裔语言文字学者，也有曾经在二三十年代提倡“国语罗马字”的专家哩。

### 戲劇、表演藝術

戏剧和表演艺术活动的较热闹的场面是下半年出现的。由五月底开始，星加坡艺术剧场，工艺学院中文协会，实践艺术学院，丽的呼声话剧组，实验剧场，生活剧社……等，便先后呈献出他们辛勤排练成功的精彩节目，演出频密，使观众几乎目不暇给。本来联邦方面还有一个《春雷文艺大汇演》，由雪兰莪福州会馆康乐股，琼联剧社合唱团等六个机构联合发起组织，拟巡回全马各地，为独立中学发展基金筹款，参加节目的有四十多个团体。但结果没有演出。

除了原有各团体的再接再厉，争取演出之外，本年又有好几个剧团宣告成立，包括星加坡的星海艺术研究会，长风剧社，长堤文娱团，新山的海音文艺团（脱离琼州会馆独立

注册)等。海音文艺团曾於七八月间赴龙引义演,为新文龙独筹募发展基金。星海艺术研究会也於九月间初试啼声,在国家剧场公演两晚。

根据若干剧评作者的意见,今年的各场演出,以艺术剧场的《谁是自己人》一齣较为精彩。本报《星云》版艺君的剧评文章,就特别推崇该剧。笔者认为丽的呼声少年儿童话剧组的诗剧《风浪中的勇士》也不俗,虽然剧情似乎有点牵强。同一团体的华语话剧研究组的《翻身》二幕剧,则带略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演技甚佳。其他的演出如实验剧场的《我们是一家人》,生活剧社的《喜日风波》……等,一般都认为比较去年各该剧团的节目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惜笔者因工作时间的关系,大半没有机会观赏到。

以下是个人所知的一年间戏剧演出以及包括有戏剧节目的综合艺术表演——

南方艺术团:生活文艺晚会(包括白榄剧《一件小事》,小歌剧《巴杀小唱》,芭蕾舞剧《胶林里的故事》)。一月九日——十三日。(重演)

星加坡文化部、国家剧场联合主办:灵芝姑娘(古装歌剧)。一月廿七日(重演)

儿童剧社、青年剧社联合演出:春雷文艺晚会(包括歌剧《巴督山的传说》,《王二小放牛郎》)。一月十八——廿六日,二月一日——三日,二月八日——十日。

圣约瑟黄昏中学戏剧研究会:《嫁》(三幕剧,马骏作)。三月廿一——廿二日。

吉隆坡剧艺研究会：赤子心（四幕）。三月廿日。

檳吡雪三州文化团体联合举行：文艺观摩晚会（包括朗诵剧《祖国在呼唤》）。五月十一日安顺演出。（参加者：檳城理科大学华文学会，安顺三民校友会，安顺道鸚慈善剧社，冷甲华侨校友会，大港青年会）

星加坡艺术剧场：五月话剧晚会（会员集体创作独幕剧：长袖善舞，不再糊涂，谁是自己人）。五月廿日——廿六日，六月八日——九日。

丽的呼声厦语话剧组：厦语舞台剧（风雨牛车水，血债十八年）。六月一日——三日，六月十九——廿日。

星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文艺晚会（包括朗诵剧《阿光想通了》）。六月五日——七日。

实践艺术学院：学习汇报演出（包括话剧《四亩地》）。七月三日——五日。

丽的呼声少年儿童话剧组：《飞吧年青的心》创作学习晚会（包括诗剧《风浪中的勇士》）。九月三日——五日，九月十五日——廿二日。

星海艺术研究会：文艺晚会（包括短剧《神经衰弱症》）。九月十七、十八日。

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研究组：翻身（二幕剧）。九月廿四——卅日。

实验剧场：综合性文艺晚会“让我们在一起”（包括六场话剧《我们是一家人》，讽刺剧《不许叫痛》）。十月六日——十五日。

星加坡艺术剧场：十月欢唱晚会（包括音乐舞蹈造型“苦大仇深记心头，欢欣鼓舞迎朝阳”）。十月八日——十日。

吡叻华工服务剧社：日出。十月（日期不详）。

星加坡艺术剧场：亚添叔（会员集体创作四场话剧）。十二月十六——廿二日。

生活剧社：综合性文艺晚会（包括二幕短剧《喜日风波》）。十二月廿四——廿六日，十二月卅——卅一日。

至於侧重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的献演，据个人的不完整的资料，也有下列多场：

一月——星加坡国家剧场：鼓乐迎春。（廿五、廿六日）。

二月——文化部、国家剧场主办“春之声”文娱晚会（二月三日），星加坡电台主办“音乐会”（廿四日）。

四月——人协文工团“民众文娱”（廿一日），星加坡青年华乐团、星加坡青年合唱团“音乐晚会”（廿五，廿六日）。

五月——华乐团“五月协奏”民乐晚会（廿四日），国家剧场俱乐部“欢乐之声齐歌唱”（廿五日），星加坡文化部主办“大众音乐晚会”：“和谐之音”（廿六日·佳音合唱团，佳音女声合唱团，爱国儿童合唱团联合演唱）。

六月——康声音乐小组主办“康声之夜”（十日），星加坡电台主办“音乐会”（卅日）。

七月——星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军营歌剧”（十三日

），星加坡工业职工会、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演唱会”（廿日），文化部主办“竖琴歌乐会”（廿一日），星加坡青年节“音乐与舞蹈表演”（廿一日——卅一日）。

八月——星加坡人民协会：“国庆遊艺晚会”（十一日），教育部音乐组主办“教师音乐晚会”（廿三日），李豪合唱团：“中国民歌晚会”（廿四日）。

九月——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华文组毕业同学会“音乐晚会”（三日），马六甲华人社团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筹募独中助学金），马口亚逸依淡青年会“会庆文娱晚会”。

十月——星市音乐会：“音乐晚会”（十八、十九日）。

十一月——星加坡教育部属下教师合唱团“常年音乐晚会”（九日）。

十二月——星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庆祝七周年遊艺晚会”（五日），凤凰舞蹈团“大型舞蹈演出”，警卫团十周年纪念演出（七日），星武装部队文工团“绿色旋律”晚会（廿一日）。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各剧团出版的许多演出特刊，内容甚为充实，可以部份弥补一年来定期杂志刊行的短绌。其中有些资料性文字，如“一九七三年本地正派表演艺术活动资料汇集”（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特刊），“五十年代上半期星洲表演艺术活动”（实验剧场特刊），尤其值得重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 附 編



## 文化建设刍议

### (一)

马来亚百多年来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文化受到轻视，特别落后，以致有所谓“文化沙漠”之讥，因此，有人希望联盟政府在宣佈独立建国开始的今天，能够把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列为当前的一大急务。因为一个国家，纵使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确立自己的路线，但如果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则精神上还是套上别人的桎梏，算不得完整的独立。要想取得一百巴仙的默迪卡，就必需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创造自己的精神财富，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

我以为，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不论在任何时候提出都是对的。

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首先有需确立新的教育方针，改变殖民地教育政策。

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本来是决定於殖民地的经济制度的。大家都知道，殖民地的经济制度，主要是在供给宗主国

以工业生产的原料，又反过来替这些工业的先进国家推销其製成品。为了适应这种形态，在教育上，便造就了大批的买办人才和洋行书记之类。一切的教育设施，教学方法，就都为了这一目标而制订。於是，我们文化落后，人才缺乏，没有发明，没有创造。向来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亚没有伟大的文学家？”或者是：“为什么马来亚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去年底，女作家汉素音还在南大演讲这一问题，大家的结论究竟怎样，我没有留意，但我以为问题的主要癥结，还是在於殖民地的教育制度有待改变这一点。

新的教育方针，应该注重於学生的思想的启发，创造力的培养，政治认识与爱国精神的提高，集体生活与爱好劳动习惯的训练，而不是一仍旧贯地注重於零碎的常识的灌输与考核。应该给予各民族的教育以平等的待遇，扶助各民族学校的发展，不是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某些民族的学生，或用经济力量来束缚民族教育的进步。那些限制学生旅行，责成华校董事自行修葺和建筑校舍的措施，都是不大明智的。只有积极的指导学生活动，扶助民族教育，才能有效地培养出本邦所急需的各种人才。

新的教育方针，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师资，重视教师的进修，吸取现有教师的宝贵的教学经验，引导教师贡献出他们的独有的心得与才能，来促进马来亚的教育工作。如果再援用过时了的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以“可能危害本邦公众人士，学校及学生利益”为理由，无需举出具体的事实，即拒绝或吊销教师的注册；或者採用刻板的考试方法，

来淘汰教师，甄选教师，分散教师们的教学精神，进修时间，以及对于更重要的教育问题的研究的专一，那就足以影响到马来亚的师资人才更形缺乏，影响到教育事业的成就的迟慢。

新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不但应该充份利用现有的在职的师资人才，还应该尽量网罗可能献身到这一伟业上来的新人才，尤其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师资，使大家都能各尽所能，共为马来亚的进步而努力。因此，当局就有需於打破传统成见，尽量承认各地大学的学位。最近报载教育部长发表谈话，否认政府准备承认南大学位；又据传说，其他大学学位的持有者，也只有是联合邦的公民，才可能获得当局的承认，这些都是落伍了的观念。学术没有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公民与非公民的分野。

## (二)

其次，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需要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马来亚很早以来，就是各民族杂居的土地，本来，各民族的人民及其文化，都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才对，但以前却由于民族优越感的作祟以及其他原因，产生了民族文化歧视的现象。某一种民族的文化是正统的，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方言的；教育是方言教育，文字是方言文字，电影是方言电影。这么一来，各民族的文化，连平等发展的机会都没有，文化交流运动，更是无从谈起的。

今天的马来亚自然不应该再存在着一等民族与次等民族，正统文化与方言文化的分别。联合邦的新宪法，亦规定将平等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因此，我们料想民族文化歧视的现象，将会随之消失，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发扬光大的机会。但这祇是消极的乐观，我们应该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新的马来亚文化，创造马来亚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在世界上呈露出本邦的独特的光彩。

我们需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意义还不止此，尤其是在目前，它还有更加重大的作用。

第一，马来亚各民族，和睦相处，虽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争取默迪卡的运动中，尤表现出不可击破的团结力量，但由於各种因素，互相间却还存着几分隔膜，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最近一年来，大家對於宪制问题的争执，充份暴露了这一事实。马来朋友们始终坚持要享有特殊的地位，有些华人又拚命争取保留英籍民的特权，足见大家對於今后的处境，还难免怀有若干不必要的顾虑。这种民族间的隔膜，如不努力打破，加上一些别有居心的份子，宣传排华，製造摩擦，就可能引起更加严重的纠纷。本年初檳城的骚乱事件，就是一宗惨痛的教训。但即使到了最近，这些企图破坏团结，煽动纠纷的野心家的活动，也还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例如霹雳的若干村落间，就时常出现一些谣言贩子。这种情形，或者今后还要更形恶劣，也说不定。各地的民族亲善委员会的相继成立，或者也有助於民族间的合作，但最根

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因为文化是藉以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最重要，最有用的锁鑰，如果华巫人民瞭解了彼此都是爱好和平，亲仁睦邻的民族，相信大家所有的隔膜与顾虑，必将大为消减。

第二，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化，源流不同，历史久暂不一，有的各具优点，需要互相学习，有的比较落后，亟待加速提高。这种情形如果陷於自流状态，各自摸索方向，那就难免事倍功半，进步迟慢。反之，如果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让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截长补短，溶汇创新，那不但是创造独特的马来亚文化的正确的，唯一的途径，也是目前丰富与提高各民族文化的最有效，最迅捷的步骤。譬如说，巫语现在虽被规定为本邦的国语，但即使是马来语文专家，也认为它的语彙语法，正待大量的充实，更应该加紧向印尼学习。记得去年在新山召开的马来语言文学代表大会，就有关於这类问题的讨论。我们相信，如果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巫文语彙就会很快地丰富起来，语法也会很快的缜密起来，其得益一定不下於单单去向印尼学习的收穫。同样的，其他民族也会很快地学习到马来民族在语言艺术上，以至音乐，舞蹈，美术上的各种特点，以充实自己的文化。正如中国的汉族，在过去三四十年间，由於和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立刻学到了很多自己所短缺的东西，如缜密的语法组织，油画水彩的特殊手法，舞台的灯光设计，音乐的和声艺术等等；最近几年来，由於积极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又接受了兄弟民族的一些特长，如新疆与西藏人民的优

美自然的舞姿与乐调等等。於是，历史悠久，渊源深远的中国文化，又更加丰富起来了。它先后创造了新语法，新国画，新的音乐与戏剧。在短短的三四年间的进步，超过了闭关自守时代的一两个世纪。这就是文化的交互影响，溶冶汇合的巨大作用。

第三，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加强人民的马来亚观念。这种提高人民认识的工作，光靠着官方的几篇文告，电台的广播宣传，那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藉助於各种文化活动来鼓舞，教育，表扬，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但目前各民族的文化活动，大体上还局限於各自的范围，未能普及到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各有其特殊形式，未能充份为其他民族所接受。这也需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溶汇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使到各种文化活动，扩大其教育功用。

所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不但是创造马来亚文化的适当途径，也是目前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必要的措施。

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首先必须鼓励各民族的文化活动以及书刊的出版工作，放宽对於文娱节目的检查以及书刊发行的限制。如果把一些富有艺术性的民间舞踊，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禁止表演；如果把一些内容健康的学术文字，认为不良出版物，限制销售，那么，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成了问题，自然谈不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唯有各民族的文化活动，书刊出版，表现得蓬蓬勃勃，才能促进交流的工作，并进一步产生马来亚的新文化。记得不久以前，报载新加坡出版的一份巫文报刊，未见明文公佈，就被新山当局禁

为改变一下选派青年到欧美去镀金镀银的旧作风，今后多派巫印学生到华文的中大学去攻读，一方面又多多的帮助华印人精研巫文，翻译人才就不怕短绌了。

### (三)

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的另一必要措施，是大力鼓励东南亚问题的研究。

东南亚问题，特别是马来亚问题，与当地人民最有切身的关系，亦藉以构成当地文化的特质。当地的文化人，对于这一部门的学术，诸如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本来应该是十分热烈与深入的，但实际上却不然；倒是陷于自流状态，没有很好的成绩。这原因，主要是一，政府有意无意地加以漠视，没有鼓励研究；二，言论自由有限制，学者们不能畅欲所言；三，殖民地社会，学术不值钱，一般人少有研究的兴趣，更少有作为专业研究的可能。所以当地人民，对当地的情形，没有深刻的认识；外国人士，对于马来亚的了解，更是不容易正确的。向来有些外国人，走马看花地到马来亚玩了一会儿，便大谈马来亚问题，无中生有，诽谤华人，而居然有人相信，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自然，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著述，一向也非完全没有，尤其是英日荷等国的学者，更多这一方面的作品问世，以致当地有些懂得外文的人士，把他们的作品拿来翻翻炒炒，倒也很有可观。但这类著述，虽然不少，却往往或囿于政治成

见，或由於方法上观点上的问题，谬误歪曲之处，所在多有。抛开这些不谈，单就材料的搜集而言，也是很欠完整的。最近霹雳木威镇附近的甘光哥打胶园中，发现古塚多座，年代和来源问题，说法纷纭，言人人殊；有人去翻查一些史书，又发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一百年间，木威一带情形，混乱不明，现在正待考古家去研究。我们试想，霹雳幅员不广，十六世纪初叶距离现在，也非悠久，却有长达百年时间的情形，未被史家搞个清楚，可见不但马来亚的很多问题，恍若一片处女地，正待学术家们去开辟，连有关资料，也待大大探求呢！

因此，鼓励研究当地问题，藉以提高当地的学术水平，发扬当地文化的特质，加深人民對於当地情形的认识，纠正以前一些有关这一方面著作的观点与事实上的谬误，把马来亚的真相介绍给国际人士，更改一般的观感，乃成为今日的马来亚的当务之急。

东南亚问题的研究，在若干邻邦中，现在也正极受重视；我们對於当地问题的钻研，不但不应落在友邦人士的后头，还应该进行得更加热烈，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单就当地历史的著述而言，我们至少就要有一部完整的通史，文化史，文学史，美术史，音乐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史，交通史，建筑史，宗教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的沿革史等等。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应该，而且可能搜罗得更加详尽，更加丰裕。像“马来纪年”那种民间传说，恐怕现在还有很多保留在马来民族的口头上吧。

各个大学，固然应该有个小规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今后的马来亚，尤应该有一个中央研究院，聘请当地的东南亚问题专家为院士，确定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研究。研究院可以不断地吸收一些有志於这种专门学问的文化青年和大学生为研究生，以培养新的人才。这些员生，又可以分门别类，成立各种小组，如马来民间艺术研究组，各民族民俗研究组之类，进行深广的研究工作。

自然，對於个别的业余的研究者的鼓励，更是不能忽视的，诸如给予搜集资料上的方便，协助著作的刊佈出版，设立各种奖金……等，都是可行的办法。尤其重要的是要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马来亚人民进步党，不久前批评新宪法草案，认为按照草案上的条文，人民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还是缺乏保障。可见，言论自由问题，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澄清。

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问题重大，牵涉至广，上面所说，祇是偶然想起的几点，谈不上周详的建议。

（一九五七年八月）

## 编余杂谈

最近，《文艺》版的好几位文友的来稿都谈论到“编者删改来稿”的问题。有的认为一个刊物如果没有征稿简则，声明“编者对来稿有删改权”云云，就不应该对来稿“大杀一场”。有的则以一篇作品的思想情感，及作者所具有的独特作风，不容更换与破坏为理由，坚决反对编者大事删改来稿，认为这样的删改法是“包办代替”，会“束缚了作者创作性能的合理发挥”，甚至“大大地阻碍了真正文学家的诞生”；他们希望和各刊物的编者共同讨论这一问题。

我是编过一两个刊物的，现在也还在兼编刊物，我想写出自己在处理来稿方面的一些经验，以为大家参考。但对于P君所提到的涉及别的副刊的问题，却不拟参加什么意见。

根据我所见到的，一般刊物的编者对待来稿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几乎每稿必改。这一类的编者，有的是文字的修养极好，对于一般的来稿，都尽力给予增删润色；有的是时间充裕，或者责任心重，常常仔细地阅

读来稿，发现了不大恰当的地方，纵使无关宏旨，也都一一给予改正。有的则是醉心於编者的删改来稿的“威权”，不管来稿好坏，不问是否需要，总得提起红笔来“杀”它一两段，或者改动一些字句，彷彿不如此就不过瘾，不如此就不威风似的；还有的是偏爱短稿，讨厌长文，遇到较长的作品，一律大删特删，或者除头去尾，或者拦腰砍截，只求符合自己所圈定的字数，不考虑到文章的完整不完整。战前，中马有一个副刊的编者，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生。他每天一定要发出两首短诗，每首三四段，每段四行，加以花边，对襯地分排在两个边角，有时是左上角对右下角，有时是右上角对左下角。自然，作者们寄来的诗稿，是不会篇篇都符合於他的这个标准的，於是乎，他就拿来删改，一些百几十行的诗篇，也一样被改头换面，製成那么三四段，装入他的花边里去。后来，作者们每当谈起这个副刊的时候，都不直称它的刊名，只要有人伸起两手，比成两个对襯着的花边的形状来，大家就会意地相视而笑了。这也是马华文坛的一个小掌故吧？

和这些情形恰好相反，第二类则是几乎一字不改。这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工作繁重，没有功夫改稿；有的是程度问题，不敢动辄使用红笔；有的却是想抽出一点时间去多打几圈卫生麻将，或者创作自己的伟大作品，因此，他们尽量选取一些文字通顺，四平八稳的稿件；凡需略加修改，或内容有些疑问，需要查考的，都丢弃了。结果，刊物编了出来，也同样是漂漂亮亮的。还有一些才子气十足的编

者，更是不管它漂亮不漂亮，只要他认为可用的稿子，就多发几篇出去，虽然别字连篇，不通满纸，也都听其自然，懒得去理睬了。不过，这样编法，大抵是限於一些风流名士，或者红牌作家；一般的编者，都还不敢於这么“难得糊涂”的。

照说，介於上述的两类之间，应该还有比较理想的一种，那就是：不包办代替，也不完全採取放任的态度；一方面尊重一些文字成熟的作者，不需要改时不要勤改；一方面也尽量提拔新人，把一些有问题的稿件修补润色，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听说茅盾先生编辑刊物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在马来亚，我所见过的，大抵脱不了上述两类，或者接近於其中一类，不是几乎有稿必改，就是差不多一字不改。就中还是属於第二类的居多。像P君所说的“包办代替”的情形，其实倒是罕见的。因为星马的一般刊物的编者，特别是在现在，是很少能够有那么充裕的时间的。他们大多是一个人要负责一个以上的副刊的编务，或者独自编辑一个份量相当可观的定期杂志，加以来稿踊跃，积履盈筐，每天单单应付拆信、看稿，选稿，退稿，设计版式这些工作，就已经成了问题，那有什么功夫来“经常把十张稿纸删剩三四张，还加上四份一的自己的东西”呢？

现在谈到我自己的情形。

我也是属於不改稿的一派，但有时也不客气地大“杀”一场，然而又非想做得恰到好处，或者决意帮助新人，而是

因为我有自己的删改稿子的一些小标准。

原则上，我是绝对尊重作者们的心血，不轻易更动他们一字一句的。这原因，除了想保持作者们的独特的风格，尽量避免束缚大家的创作性能的发挥，一如P君所主张者外，还有的是：一，时间关系；无法在来稿上面字斟句酌。二，个人习惯；我宁愿在选稿方面，以及字数的计算上，版式的设计上多费一点精神。三，自量能力；可以用的稿子，我不一定能把它们修改得更好，不能用的文章，我又常常无法帮助它们达到发表的一定水准。因为这类文章，问题大多是在於内容方面，一点文字上的润色是无济於事的。要在内容方面给予“包办代替”，也需有相当的本事才行，而我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还有一些投稿者，他们不要求文章一定发表出来，祇希望编者在退稿时对一些错误的字句给予改正。这一点，我也未曾做到，理由是工作上应付不来，同时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一个作者要把文字搞好，主要还靠多读多写，其次则需要有人当面指点，仅在来稿上添改几个字，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且，我所改的，也未必就对，有时反而会贻误别人，也说不定。

然而，尽管我坚持着对于来稿一字不改的原则，几年来经由我发出的稿子，却还有不少是被删改了的！而且，改的范围十分广泛，不止限于字句的更动，整段的大“杀”。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成下列几类。

一，题目。文章题目太长，编排起来不方便，也不大好读，因此，必要时我都酌量加以缩短。还有一些文章，题目

标得十分刺眼，就内容看来，却又没有这种需要。这一类题目，也常常是在更改之列。例如有一篇论文，题目似乎是“一位专家的笑话”，我认为这是可以不必的，所以给它另外换一个。

二，笔名。有些来稿，署着已经有人用过的笔名，只要我能判断出那并不是同一作者的作品，就都稍为加以改易。我认为，一个笔名凡是已经有人经常在用，而且几乎已为写作界所熟知的，其他的作者，就应该勿再采用，以免引起误会，甚至无谓的纠纷。当地的写作界，这一类的双包案，也似乎不乏先例。几年前，就有了两个“周槃”，后来又有了两个“冰梅”，两个“沙风”；去年，不知怎的，又多了一个“林辉”在写诗评，其实，“林辉”已经是另一个作者的笔名，在当地的一些刊物发表过不少的文章了。我觉得这种易於引起误会的现象是很不好的，如果作者们无意间用上了别人的笔名，编者有所发觉，就有随时给予更改的必要。又有一些笔名，虽然不是和此时此地的作者所用的一样，却是和马华若干旧作者相同，如“雷克”，“西玲”；或者和中国若干作家相同，如“宋扬”，“田军”；这些，我觉得也是应该改掉的。此外，有的笔名做得酸气十足，如“啼痕”，“泪影”；有的是半中不西，如“路易士陈”，“詹姆士蔡”，有的则故作滑稽，如“琼州人”，“老太公”，“星洲峇峇”，“唐山娘仔”，“安乐氏”之类。这些作者的稿件，如果可用，笔名方面，我就大胆地加以“包办代替”。因为我并非在编“小说林”，要一些“东亚病夫”来流泪呕血，催人鼻

酸；也不是在编“论语半月刊”，要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来使读者发笑，叹为幽默。至於“包办代替”的方法，大抵是改用作者的真姓名，或者把他们原来的笔名删去一两个字。如果一时想不出适当的改法，就把稿子暂且压下，慢慢地想。记得前些时在编杂志，有人寄给我一篇小说，内容还好，祇是署名“拾一佬”，我认为这样将会降低作品的严肃性，甚至使一般文艺青年不屑一读，於是想把笔名另改一个，再予发表，然而因循拖延，始终没有改成，稿子也就一直搁置着，没有刊出；过了好几个月，终於看见它在另一个刊物发表了，大概是作者等得不耐烦而改投去的，现在想起，还觉十分歉然。但我依旧不肯改变我的主张：笔名太怪，可能引起读者的厌恶，因而影响到文章的内容，就非“包办代替”不可。有一次，一个熟人用了一个半中不西的笔名，被我改掉了，他有点不满地说：“你真是太过独裁了，连人家的笔名也要改！”我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只有报以苦笑。

三，赘文。有些来稿，说它创作不是创作，说它在研究问题又不是在研究问题，只是东抄西袭，拚凑成章，资料既非新鲜，自己又无创见，譬如写《中秋杂记》，就抄了一些古人的吟咏中秋佳节的诗词，加上各地的风俗志，兼及有关的考证，笑话，谜语等等，拉拉扯扯，不知所云。如果是“谈创作”，则把鲁迅，茅盾，郭沫若，以至高尔基，萧伯纳……等人一些有关创作的论述，尽量抄了下来，然后下结论道：“我们要向这些伟大的作家学习”；或者说：“这些伟大的作家的话都是很正确的。”又如果是写“托尔斯泰评介

”或者“诗人黄公度”，便首先抄了几段他们的家世略历，生卒年月，恋爱故事；其次就是他们的作品的篇名，以至内容本事，或者引录几段原文；最后，也许是搬出一些文学史家对於他们的评语来；而作者自己，也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文章这样写法，自然是洋洋洒洒，下笔万言，但编排起来，却就有点困难。对於这类稿件，我的处理法是这样的：如果作者除了详徵博引之外，完全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概不採用；如果还有一点作者自己的东西在内，就经常“杀”它几段，使到作者自己的话，不至於被太多的别人的文字所淹没；登了出来，也不至於太使读者讨厌。还有一类文章，也是经常需要整段地加以删割的。那就是一些初学写作者（大多是初中学生）的来稿。这类稿件，很多写得不大均匀，有几段充满新意，活泼生动，有几段却又是陈词烂调，而且修辞幼稚。本来，修辞造句，不大好读，可以说是一般初学写作者的通病，不过，这种缺点，如果作品内容新鲜，是常常会得到弥补的；祇有到了若干空洞无物的段落，才容易显露出来。熟练的作者，很多能够利用文字的技巧以掩饰内容的空虚，初学写作者可就没有这个办法。所以，为了把他们的作品提到一定的发表水准，就必须酌量加以删节，使这些作品显得比较凝练些。至於“杀”掉多少？用“小刀”，还是用“大斧”？那就视个别的情形而定。有时是一两段，有时是三四段，十张稿纸剩下三四张也是可能的，甚至一百几十行的诗删存十句，也曾有过。但这种情形是很少的，一个月间难得有一两次。因为那是一种最花时间的工

作。

四，词句问题。對於一些错字，别字，以及不大通顺的句子，我是不怎么去挑剔的，更懶於去查康熙字典或什么“说文解字”来一一改正。因为我觉得构成一篇文章的条件是多种多样，如题材，思想，想像力，观察力，描写表现的技巧等都是，词句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纵使有些小毛病，只要於内容没有什么影响，是可以不管的。不过，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是尽可能在发稿以及看大版时加以校正。但这也只限於一般的稿件而已，對於一些比较知名的作者的文章，除了若干极其显著的笔误，如“光辉”作“光挥”，“健忘”作“健望”这一类之外，总是尽量避免去改动的。因为名作者是大家所熟悉的，可以“文责自负”。

五，篇幅关系。有些稿子，一次登不完，分成两期又不好，我就把其中不大重要的地方，删去一两段，以迁就版位。但这种情形，又经常是和来稿的缮写方法有关系的。很多作者，并不按照原稿纸的格子来写，有时是四格才写一个字，有时又两格挤了三四个字；更有的索性不用稿纸，改用信笺或白书纸，写得密密麻麻。这样一来，字数就无法计算得十分準确，排起版来，有时剩下一大片空白，有时却多出了好几百个字；补白还有很多办法，文字太多了就只有删割。因为一个刊物，不能每一期都是一些“未完”或“待续”的文章。本来，我编的刊物，内容大多很差，唯独對於稿件字数的按算的準确，却是连一般排版的工友也常常表示驚异的；然而，不知怎的，直到现在，對於那些不用稿纸来写的文章

的编排，有时也还是颇为棘手，非借用几撇红笔，就无法拚下版去。这样的删改法，作者们自然是很不满的，但做编者的却是更加的麻烦。所以我对于那<sup>的</sup>~~的~~稿，一向总是不大欢迎。~~文章~~，是不会有骨气了，譬如，以前一个时期，~~文章~~改稿吧，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sup>髓</sup>，写出六<sup>七个</sup>~~个~~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sup>就</sup>买些送给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sup>人</sup>是不能生活在格子里的，作者们如果不学习这一方法<sup>定</sup>一些才思敏捷的作家们，每当到副刊的编辑和报章<sup>上</sup>，龙飞凤舞之际，更不便让那些呆呆板板的四方格来碍手碍脚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事实，就是：铅字还不是胶製品，可大可小，伸缩自如；文章排不下版，有一部份仍然是要割爱的。想避免这一点，暂时祇有向四方格子低头。我的聪明的朋友，终於也不能例外，玩笑开过之后，还得勉强地回到格子里去生活。

六，思想内容。此时此地，说话困难，不好开罪“名流”，更不好“伤官损民”。因此，来稿如果有些不大“妥当”的字句，我便略加删改，不管作者们满意不满意了。M君在《孔子删订诗经》一文中，强烈反对把“我们反抗，所以我们存在”，改为“我们希望，所以我们存在”。我相信这是一个实例，一定有某一编辑这样改过来稿的。M君认为这样改法，就等於宣佈“存在”的“死刑”，我觉得这倒是很难说的。有时，你不宣佈“存在”两字的“死刑”，就得宣佈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刊的“死刑”。所以，问题似乎不在於那个编者改得对不对，而在於是否需要这么改法。这一点，

我以为应该先看看具体的情形，单凭一个句子是无法批评的。在某种情形之下，我倒是会同情那位宣佈了“存在”两字的“死是不怎么值得挑剔的”譬如我自己，从前就曾经把友人林君的“解字”来一一改正。因为我竟就有春天！”改成了：“有希望的如题材，思想，想像力，观察力，”“存在”的“死刑”也差不了多少。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纵使有些小毛病，其

七，缺文或漏排。是可以不管的。不过，为了方便读常常让信封的胶水粘住了原稿，与版时加以校正。但这也只就随之破损，某些字句，也就无法辨认了。作者的文章，除在字句中间，留下了几格空白，有的本来该是一个动词，副词或形容词，有的该是一个人名，地名，或年月日期，这大概是作者们在行文时，一时想不出，记不起，暂时漏去，准备在完篇之后，再来设法填上的，可是文章一写成，却急于发表，不及过看一遍，就仓卒付邮了。碰到上述两种情形，我就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代为填补。补不来的，就只有随便加以删改了。还有一种情形，原稿是完好的，发出之后，却被工友们漏排了一两行，或在拚版时被搅乱了，到了看大版时，虽然发觉有点不对，但因限于时间，无法每次都检出原稿来校正，如果那是无关紧要的所在，有时也就按照文意，稍予修改，把句子弄通算了。这也是有些来稿被删改的一个原因。

我的删改来稿，大抵就是上述几种情形。但如题目，笔名等的改动，并不是常有的事，改得比较多的，还是有关文章的思想内容这一类。作者们如果在这方面稍为“持稳”一

点，大多数的稿件总能够得到一字不改的发表，不至於被“包办代替”的。这一点，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值得大家细读的：“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吧，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真的，作者们如果不学习这一方法，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等到副刊的编辑和报章的总编辑来抽，就很可能连一根也不剩了。因为，无需讳言，编辑和总编辑，各有各的事情要做，对于来稿，总不会像作者们对于自己的作品那么用心推敲的，“小刀”使不来时，就只好用“大斧”了。写到这里，我又怀疑到P君在“反包办代替”中所指责的十张稿纸被删剩三四张的现象，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自然，这祇是我个人的推测，顺便提出，好让大家参考而已，并没有替任何一位编者辩护开脱的意思。

此外，对于一两个有关的问题，还有一点感想，顺便在这里谈谈。

E君在《我的解释》中，引述丁敬礼和曹植的一段故事说：“昔丁敬礼请曹植代其润饰文章，曹植谦虚不敢受命，丁说：‘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这故事见于曹植“与杨德祖书”，丁敬礼的话，粗浅说来，就是：“你尽管删改吧，后人都会认为那是我写的好文章，

不会知道是经你润色的。”所以曹植说这是“达言”，是“美谈”。但M君却唱反调道：“我就怕人不知谁是定我诗者”，这意思似乎是说：现在的人，没有曹植那么谦虚，我也不做丁敬礼了。”我倒以为，丁敬礼那种虚心向人请益的丰度，仍然是值得我们这些写作人学习的。不过，作为一个编者，则不妨学学曹子建的尊重同文的榜样。

M君认为一个副刊如果没有公佈“徵稿简则”，说明“编者对来稿有删改权”，“不愿被删改者，请先声明”，那么，就只好贸然大杀一场，我以为这见解也不大好。所谓“简则”或者“协约”“规章”这些东西，乃是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信赖的表现，刊物的编者与作者，最好是能互相谅解，倒不必像园主与胶工，厂家与顾客那么来订立合同，约法数十章，协议几百条。而且，有了“简则”，“明来明去”，也不一定会做得合理的。校长开除教员，说是聘书期满；老板解雇职工，给予一月薪水；屋主驱逐房客，三月不收租金，这些行为，原有明文规定，不算违法，但是否合情合理，却就大成问题。同样，一个编者，利用“徵稿简则”中所赋予的“删改权”，对来稿乱涂乱改，对一些声明不愿被删改的，则愤然退回或索性丢进字纸篓里去，按照稿约看来，这并没有错，实际上却也是不合理的。至少，作者读者，都因此蒙受损失了。

M君认为孔仲尼是“第一个拿红笔的编者”，这也未必是事实。根据现代很多学者研究的结论，倒是推翻了“孔子删订诗经”这个旧说的。随手翻开张西堂的一本《诗经六论

》，里面就有一段话说：“诗的起源，本与音乐有关，诗的採集，本是乐师的事，孔子絃歌之本，应即当时乐师传出之本，我们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孔子本无删诗之事。墨子引书，多与儒家不同，而说‘诵诗三百，絃诗三百’，与儒家同，也可以证明诗的流传在孔子时，只有三百五篇，孔子并无删诗之事。”M君指出孔子也曾不客气地说：“吾自卫返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其实，“正乐”不一定是删诗，也有很多人论述过了。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深，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於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何不即论语诸文而一细读之也。”（转引自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版）。这么说来，孔夫子倒像是一个最会尊重作者们的心血的编辑了。不过这是一个学术专题，我所懂得的不多，还是让一些对诗经比较有研究的作者去讨论吧。

（五八年七月）

## 读报随笔

### 《浮生六记》巫译本出版

报载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册《浮生六记》的马来文译本，引起了马来文艺界的广泛注意。

马来亚联合邦华印各族人士，近年来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高潮，华巫文化交流的口号也高唱入云，文艺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因而受到重视。许多马来民族的文学名著，已先后被译成了华文；在一般报章副刊和杂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鸭都拉，东革华兰，哈崙，沙末赛益等古典的或现代的马来作家的名字；在各书店中，我们也可以买到《虾多盐也多》，《刀尖下的生命》，《马来短篇小说选》……等译本或选集。但这些都是属于马来文学介绍方面的工作，至于把华族的文艺作品译介绍给马来文艺界方面，却就做得很不够。据笔者个人所见到的，祇有若干中国的旧诗或寓言的巫译，在一两个华文报的《国语周刊》上发表；星洲维明公司出版的两期《学好马来语》，也有一两篇马华文艺作品的译介。比较长篇的翻译并且印成专书的，还应以牛津大学出版

社这次印行的《浮生六记》为第一本。前些时，听说有一两位马来作家已经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而且在筹备印刷，却不知道何以到现在还不见出版。文艺作品的选译，本来应该兼顾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浮生六记》虽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社会价值不高。希望它祇是一个开端，引导一些更有意义的文学译本源出现。

(六一年十一月十日)

### 文化交流

吉隆坡马大经济研究会，本月九日主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合并后星马新的关系”，由联合邦副工商部长 谢添瑞，黄汉章律师，社阵执行秘书罗兰，和马大经济系讲师林忠雅等分别主讲。黄汉章律师在谈到文化问题的时候，说了一段颇有意义的话：“本邦各族人民，各有其特出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系统，……如果各族的风俗习惯能够互相交流，将来各种各样的风俗都出现於本邦……岂不是更加美不胜收？”

一个国家的文化，本来是源流愈多愈好，形式愈多愈妙。文化源流众多，形式繁富，愈能充实一个国家的文化，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可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譬如一个区域的地方戏剧，它的剧种剧目愈更多种多样，就愈更使到一个地区的戏剧艺术显得多姿多采，丰富当地人民的

文化生活。所以很多戏剧艺术的工作者，不但都在设法保存并发展现有的剧种剧目，而且还辛辛苦苦地去发掘已经埋没了的剧种剧目。

马来亚能够得到好几个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汇合交流，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这些民族的文化，都是源流长远，精深博大，累积了千百代人的智慧与经验，各有其优秀与特出的传统，只要能够因势利导，扶掖培植，而不是歧视，抑制，那么本邦的文化的发达，人民生活的充实丰富，恐怕世界上是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比拟的。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内容问题。即是要求各种源流，各种形态的文化，具有马来亚的特徵，符合本邦人民的生活与愿望。

（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 《荷珠配》的演出

报载：紧接着艺术剧场公演《面子问题》之后，新加坡醒华校友会也将趁该会庆祝九周年纪念的机会，假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六场古装喜剧《荷珠配》。

《荷珠配》原为川剧的一个戏目，近年才由老舍改编为话剧。把这么一个由地方戏改编而成的话剧搬上舞台，在马来亚可能还是第一次。即使在上海各地，也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艺术。因为改编地方戏为话剧的工作，直到目前还是处在试验的阶段。

老舍在话剧《荷珠配》的序言中，曾写出一些他改编这个剧本的经验之谈。大意说，话剧在形式上有它的特长，譬如情节的穿插方面能够做得更集中，更简炼；但短处是不易像戏曲那样运用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其次，某些戏曲，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也未尝不可，但话剧却要求有较好的思想内容，否则既无歌舞，思想又平平无奇，那么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戏曲。然而如果补充了太多的思想内容，又恐怕改来改去，面目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因此他认为由戏曲改编的话剧，需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更重要的是再创造；要做到新旧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

这样的一条改编地方戏为话剧的途径，是否走得成功，那就要看这一次演出的成绩了。

（六四年四月十日）

## 电影与电视

联艺影片公司总经理巴比力氏，最近在新加坡发表演讲，透露自从去年本坡出现电视以来，电影业受到广泛的影响，电影观众减少了二十余巴仙，电影戏院也逐渐减少。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待寻求出一条适当的

途径。

电影与电视，娱乐形式相同，观众范围相同，竞争的结果，自然是有一方面要受到影响的。但电影公司如果能够提高影片製作的质量，则在竞争中应该还是佔着绝对的优势。以目前新加坡的情形而言，很多戏院上映的都是首轮片，而电视所播放的经常是第三四轮片子。这些第三四轮的影片，居然能够拥有广泛的观众，原因固然很不少，譬如观赏的方便，省费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由於一些新影片缺乏一种强烈的对於观众的吸引力，因而使到一般观众认为不妨留待电视机播放时再来补看；或甚至认为新不如旧，与其赶着去看那些素质不高的新片，不如从从容容地坐在屋内欣赏一两套已有定评的旧片。如果电影公司能够普遍地提高製片的水平，使得观众对於首轮影片都以先睹为快，情形可能就会大大的不同了。

据笔者所知，目前很多影迷对於一些旧影片常常存着一种怀念的心理，书坊间若干根据旧影片的情节来编写的电影小说或剧本，如《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卓别麟的《淘金记》和《大独裁者》等，销路都很旺热。这种现象如果不是因为观众都患了怀古病，觉得过去的都是好的，那就值得製片商们深思了。

（六四年四月十七日）

《大安》和《书报》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副主任欧顿米勒博士，最近前来本邦访问，与当地书商及图书馆人员，讨论有关该大学搜集当地出版物问题。据说该大学目前正在推行一项计划，广泛地搜集东南亚区的出版资料。

这一个消息显示了欧美学人对于本区的出版界情况已有相当的重视，同时却也颇为隔膜。因为重视，所以不惮跋涉重洋，千里迢迢地到来搜集出版物，但也正是由于隔膜，由于彼此文化交流的工作做得不够理想，所以才需要为了搜集一些出版资料而远道前来实地访问。

笔者曾经见过两种日本杂志，刊名叫做《大安》和《书报》，由东京的两家大书局编行，每月出版一次，内容都是介绍一月间出版的日本汉学界的著作，翻译作品，以及中国，香港，星马各地运到销售的华文新书。间也有些关于汉学的英文书刊。这些新出版物的书目，作者，定价，出版社，都被详细列出，一部份比较重要的还附有内容提要，以及批评分析的文章。此外又有若干作家访问记，各地学术界动态报导等等。想来东京方面出版的这一类杂志应该还有一些，全面介绍日本出版界情况的刊物恐怕还要更多。通过这类刊物的销售流布，不但可以使到世界各国读者对于日本出版界的情况瞭然于胸，还可以利用邮购办法，得到所需要的资料，不必实地前往搜集，这是多么方便简捷的事。星马的出版界，几时才能够有一两种这类杂志的编行呢？

（六四年五月七日）

## 喜剧会串

这几天，新加坡电影戏剧研究社正在维多利亚戏院公演“喜剧大会串”，推出的剧目是《牆》，《可怜的斐迦》，《求婚》，《离婚》等四个独幕剧。其中《可怜的斐迦》和《求婚》两齣，都是大家熟知的世界喜剧名作。

在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好几种样式或风格的作品，一向是比较缺乏的。其一是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历史剧，如《屈原》，《南冠草》，《胆剑篇》。其二是感情热烈，意象奇幻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另一类就是格调轻快，充满着幽默，机智，以及深刻的讽刺的喜剧，如契诃夫的《求婚》以至果戈里的《巡按》等。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关系到本邦的历史背景，文化遗产，以及社会现实；有的是由於一般文艺作者對於历史知识，社会知识的比较贫乏或生活圈子的太过狭隘，平淡；也有的关联到整个民族的传统性格和一般上所接受的文学传统。若单就喜剧一门而言，则还有一个稍为特殊的原因，就是这种文学样式比较不易掌握。因为喜剧和滑稽笑剧形貌相仿而实质不同，写得不好，常常要流於低级趣味，纯以笑谑胡闹来取悦读者或观众，好像当地的某些歌台戏，那就差以厘毫，谬以千里，失去喜剧应有的社会意义了。但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可以克服

的。

研究喜剧，重视喜剧，较多地创作喜剧，表演喜剧，也是目前马华话剧界的一个工作方向吧？

（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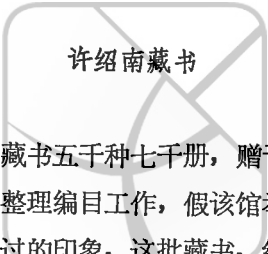
### 本地创作音乐会

新加坡最近举行了一次“本地作品音乐会”，颇受各方注目，报章上也发表了许多评论文字，提出好些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若干论者，认为在这一次音乐会中，好些作曲家同样走的西洋学院派的道路，一方面创作出了优美动听的旋律与和声，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却又都是抒发个人的感情，以致怀念忆旧一类的歌曲，佔了音乐会的作品五十巴仙以上；因而建议当地的作曲家，今后应尽量使到作品内容多样化，从更广阔的生活中找寻丰富的题材，避免单调狭隘的缺点。这意见不但值得作曲家们重视，也很值得其他部门的艺术创作者参考。

题材多样化，對於各种艺术样式的创作都是重要的。歌曲的编写，固然不应老是限於怀念忆旧的调子，就是绘画上的花鸟虫鱼，摄影作品上的拖网晒网，舞蹈表演上的烛舞伞舞，以及文学创作上的男女爱情这一类题材，也应该尽量设法突破，力求推陈出新。艺术作品的主题，一般上贵乎明朗单纯，但题材方面却要求多姿多采，画幅开阔。

要克服题材单调狭隘的缺点，首先得靠艺术家的不断努力，充实生活，增广经历，拓大胸襟；同时加强思想修养，提高对于社会人生的观察力。其次是艺术作品发表及演奏的尺度必须尽量放宽，使到各种流派风格的艺术家得以展开竞赛，各显所长，相摩相盪。唯有这样，才有希望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盛景来。

（六五年五月六日）



### 许绍南藏书

已故许绍南氏藏书五千种七千册，赠予新加坡大学中文图书馆，最近完成整理编目工作，假该馆举行移交仪式。

根据笔者参观过的印象，这批藏书，约略可以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古版书或战前各书局出版的古人的著述，包括线装书与普通铅字排本。这一部份的份量不多，除了戏曲方面的搜求比较着力外，其他各部门都很不完备。一些册数较多，但个人的能力还可以购置的丛书，如四部备要或国学基本丛书之类，这里也只有若干散册，没有一部是完整的。然而其间却有一两部明刻善本，刻印之精，书法之美，实在罕见，值得欣赏一番。

第二部份是大批旧杂志以及近人的著作，包括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的一些学报，文艺期刊，文学团体丛书，当代作家学者的若干已绝版的作品。对于一般志在求取新知的读者

来说，这里面有很多是过时的甚至是发霉了的东西（如《新月》、《论语》、《宇宙风》等杂志以及周作人之流的著作），可看可不看。有少数较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的书籍，则因目前已有大量内容更加正确充实的同类读物可以取代，无形中也使它们的价值打了一个折扣。然而对于大学教师，以及某些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部份却正是这批藏书的精华所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或撰写有关论文的一批难得的参考资料。

最后的一部份是新版书，即十余年来中国新编新印的书刊，包括作家文集，翻译作品，学术论著，以及重新整理校注的古籍。这一部份的数量，相当丰富，差不多佔了藏书的一半。大抵藏书者逝世以前数年间新加坡进口的文史哲方面的新版书，都被广泛采购搜罗，遗漏的不会太多。对于普通读者，这些新版书倒是比较实用的。

（六六年十月廿日）

## 代序二则

### 读《轻风细雨集》

同事谭亚木君，近年来在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最近他抽选了其中廿余篇，辑成一册《轻风细雨集》，付印之前，一定要我做篇小序，提点意见。在这里，我祇能写下几句读后感，做序是绝对不敢的。

看看收入集中的作品，有游记，有随感录，有抒情小品，体裁多种多样，说明作者对于散文形式的掌握有着广泛的尝试，题材方面则嫌窄狭了些。其总的特点，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在这风云震盪的大时代中，我祇看到轻风细雨的景象，……躲躲藏藏地写一点小杂感，说点小故事，……连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愿望也不敢痛快淋漓地一表无遗”。把作者的这一段自白当作对于本书的批评，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

但我个人认为，书中的几篇带着一点哲理意味的散文，如《雾》，《火堆》，《镜子的联想》，以及《随思录》，《村居拾零》中的若干片段，却还是值得一读的。读着这些

文字，你彷彿见到一个尚未沾染着现社会的庸俗气习的青年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向上，并且不时从平凡中发现真理。譬如，他领悟到火堆深处的顽强的“生命的力量”，领悟到“雾的海洋中也有道路”！

我很希望作者今后能够进一步拓大他的视野，做个他自己所向往的“勇敢歌唱生活的好歌手”。如果仍然不免好像“兀鹰盯视下的小鸡”，“没有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的勇气”，那就毋宁多向哲理散文这一方面努力，将这一文学样式运用得更加圆熟些。



(一九六九年)

文友姚鱼先生即将出版他的第一本创作集——《阳光普照》。他把校稿让我先睹为快，要我写序，但因能力所限，我照例只能写下一点读后感。

我觉得这册集子在份量上似乎稍为单薄了些，主要的作品是三四个短篇小说和几首叙事诗。同时，也许由于创作的时间不大充裕，有些文字不够洗炼，艺术构思方面也可能更加提高些。然而作品的内容却仍有不可忽视的特点。

其一是踏实。作者大抵是按照他所熟悉的事物给以如实的反映，不卖弄、不歪曲、不粉饰，但也不特别夸张。譬如

聪明的家长力促子弟选修经时济世的学科，厚黑的教师祇顾麻将过瘾，不管学生死活等等，都是我们大家习见的现象，作者随手点染，便成有趣的故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于一般幼小者和勤苦的人家有着深切的挚爱与同情。书中的大部份作品，可以说是偏重在描写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物；诸如失学的儿童，建筑工场上的小当家，孤苦无告的老人，被字花害死了的三轮车夫，乐于助人的“秀姑娘”，连梦中也挣脱不了忧患的鬼影的“猪肝婶”……。作者有时为他们的命运提出控诉，有时表扬他们的善良的品质，笔端总是透露出一份温热。

但许多作品的画面，总嫌过于暗淡了些。虽然书名《阳光普照》，其中也出现了若干硬朗的、不屈于生活的人物，如自力更生的航海青年，肚肠和身躯一样直的“猪肝叔”等，一般说来还是难免会使读者感到沮丧的。要克服这一点，我想作者可能需要拓展生活的圈子，多熟悉一些新的事物。

（一九七五年四月）

## 旧诗六首

### 假日偶成

又是榴槿上市时，背将琴剑漂东西，  
业操卖咀敢嫌贱？价比佣奴不算低。  
差幸眼花未百度，验知酒病正初期。  
但祈鸿爪长矫健，到处天涯踏雪泥。

一九四八年冬

### 除夕书怀

鼙鼓声中惊岁残，思量何处可偷欢？  
狂痴不改神犹愤，傻气依然路未宽。  
屠伯有刀成活佛，书生无卒受招安。  
由他豪贵誇先进，一阙离骚且自弹。

一九四九年冬

张君元夜招饮席上即兴

旧遊百侶半凋零，碌碌不知物候新；  
难得张君意气好，杀鸡沽酒闹芳辰。

一九六二年春

读抗战史话奉和Y君

沐猴活剧等闲看，乱世由来行路难。  
烈火洪炉销废铁，英雄豪杰闯千关。  
青山终古伴忠骨，史册无情记巨奸。  
莫计穷通与逆达，且留清白在人间！

一九七〇年夏

次V君韵

敢抛艰巨作归侨，来赏冰封共雪飘？  
万水千山待傲啸，蛮烟瘴雨未清消。  
为求灵草访华鹊，偶赋新词写舜尧。  
勿药但期归队早，战歌唱起更宏嘹。

一九七三年秋

附 V 君原作

长风万里送归侨，海阔天空夜雾消。  
力战病魔得多助，久违杨柳拂面飘。  
故交重聚思先烈，新雨初逢话舜尧。  
更喜乡山新面貌，红花遍地歌声嘹。

悼柯君

迅翁而后谁如君？扶病挥毫战斗勤。  
虎凳余生还抗日，农庐苦雨拒离群。  
两条道路清泾渭，一脉新苗感灌耘。  
行篋尚多未定稿，子期去后与谁论？

一九七四年春